

# 武则天时期的唐蕃陇右竞争考

## ——兼谈河湟部落在唐蕃之争中的地位

胡 康

**摘 要** 吐蕃攻占吐谷浑故地后，原先分布于此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等部落依然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这些部落构成了唐蕃间的“中间地带”，武则天时期的几次唐蕃势力变动都与诸部落的动向密切相关。天授年间的党项大规模降唐引发了唐蕃对黄河九曲的争夺，而长安年间唐朝势力西进至河西九曲则与噶尔家族被肃清后，吐谷浑等中间地带的部落大量背蕃投唐有关。唐蕃实力逆转后达成了对唐朝有利的神龙会盟，划界的河指的应是今共和境内的河西九曲河段，白水则位于湟水上游，唐朝由此控制了河西九曲，在陇右取得了不下于收复安西四镇的成就。此后，唐蕃的较量场地从赤岭、鄯州一线西移到了河西九曲，双方又在此展开了激烈角逐。

**关键词** 武则天 吐蕃 黄河九曲 河西九曲 党项

作者胡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湖南长沙 410082）。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4-0173-21

自从吐蕃东进后，唐朝便和吐蕃在陇右<sup>①</sup>展开了一系列较量，在这百余年的对抗中，高宗和玄宗时期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前一时期有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后一时期则有反复多次的石堡城争夺战，每一场大战均吸引了众多学者关注。<sup>②</sup> 相比之下，武则天时期的唐蕃陇右竞争受到的关注并不多，<sup>③</sup> 以佐藤长、林冠群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谈到武则天时期的唐蕃关系时，也往往只注意到了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之

① 本文的陇右并不局限于唐朝所辖的陇右道，而是指广义的陇山以西，唐蕃激烈对抗的青海湖、河西九曲、黄河九曲区域均包含在本文所言的陇右范围内。

② 大非川之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如谢全堂：《试论唐蕃大非川之战》，《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尕藏吉：《论大非川战役与唐蕃政策的转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吕博：《唐蕃大非川之役与星象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编辑部，2010年，131—145页。除了这些论文外，举凡涉及唐蕃关系史的论著，基本都会提到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如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金伟等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9年，240—251页；郑红翔：《唐蕃青海之战与陇右军事力量的初创》，《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4期。石堡城是学界研究的另一个热门问题，围绕石堡城的所在，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研究史的梳理可参见常磊：《〈石堡城楼颂〉及有关历史地理问题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3—5页。

③ 本文所言的武则天时期指的是武则天实际掌权的时期，即从嗣圣元年（684）到神龙元年（705），其间虽有中宗、睿宗先后即位，但实权依然在武则天手中，故本文一并列入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改唐为周后，陇右的边境形势与此前并无太大不同，为讨论方便，本文也一并视为是唐朝统治时期。

事，对同时期的唐蕃陇右争夺，所论较为有限。<sup>①</sup>

实际上，在唐蕃陇右竞争史上，武则天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正是在武则天长期经营陇右的基础上，唐蕃才能在神龙二年（706）达成神龙会盟。只要考虑到高宗时期吐蕃势力就已越过赤岭，尽占吐谷浑之地的背景，<sup>②</sup> 就不难发现，神龙会盟中达成的“以河为界”，<sup>③</sup> 其实已经意味着唐朝势力已大大向西扩展，<sup>④</sup> 重新到达黄河一带了。为学者所瞩目的河西九曲以及神龙会盟中的唐蕃划界等问题，都与武则天时期的唐蕃陇右竞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吐蕃治下的党项、吐谷浑等部落曾先后大规模反叛吐蕃，诸部落的每一次反叛都对唐蕃势力的消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唐蕃的陇右争夺中，处于唐蕃之间的河湟部落显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此时期内这些部落的活跃，正好为我们理解吐蕃统治吐谷浑之地的实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从这个案例出发，将视野延长，我们可以对整个唐蕃陇右之争有进一步的认识。

鉴于目前武则天时期的唐蕃陇右之争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本文希望从这一时期唐蕃在陇右爆发的几次战争出发，对党项、吐谷浑等河湟部落在唐蕃之争中的地位、吐蕃内乱对唐蕃边界的影响以及神龙会盟划界的意义等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以期深化我们对唐蕃陇右之争的认识。

## 一、黄河九曲与洮州之战

武则天时期，唐蕃在陇右的第一场大战是天册万岁元年（695）开始的洮州之战，该年“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随后，武则天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击之”，<sup>⑤</sup> 次年一月又“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sup>⑥</sup> 吐蕃《大事纪年》也提到，羊年（695）“大相钦陵在吐谷浑，于虎山汉坟场与唐元帥王尚书大战，杀唐人甚多”。<sup>⑦</sup> 吐蕃历史文书 P. T. 1287 第 15 节还记录了王孝杰与论钦陵在战前的对话，提供了

① 佐藤长高度评价了 692 年收复四镇事，认为这是西域经营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对于西域以外的南线，佐藤长并未给予太多注意力，仅简略提及洮州之战（参见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金伟等译，第 259—265 页）。林冠群已经注意到，相比于高宗时代，武则天时期，唐朝在与吐蕃的竞争中已逐渐扭转了不利局面，迎来了一个反击的时期，不过，林冠群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对唐蕃西域竞争的考察，对唐蕃陇右之争并未充分注意。在《武则天时期李唐反击吐蕃之探讨》一文中，林冠群将长寿元年收复四镇事列在了首位，后文虽提到洮州之战、野狐河之会以及吐蕃内乱后的唐蕃形势翻转，但所论都较为简略，对吐蕃内乱后，唐朝势力的西进也未充分注意。参见林冠群：《武则天时期李唐反击吐蕃之探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 195—218 页。即使是重点讨论唐蕃陇右军事竞争的学者，对武则天时期唐蕃在陇右的战事也所论甚少，反而是对西北战事给予了重点关注，参见郑红翔：《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对吐蕃的军事对策——以陇右节度为中心》，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24—28 页。郑文简略提及了洮州之战以及其他河西、陇右唐蕃战事，但对这些战事爆发的背景及影响，并未深入讨论。

② 大非川之战后，“吐谷浑全国尽没”（《旧唐书》卷 5《高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吐谷浑的控制区被吐蕃全部占领，青海之战后，吐蕃势力越过赤岭。关于唐高宗时期吐蕃的东扩及唐蕃势力界线的变化，可参见胡康：《从河源到赤岭——论唐高宗时期吐蕃在陇右的东扩》，见《唐研究》第 28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569—598 页。

③ 《册府元龟》卷 992《外臣部·备御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11650 页上栏。

④ 郑红翔注意到了《郭元振行状》所载唐朝在长安年间西进至青海湖之事，但仅是简略提及，参见郑红翔：《安史之乱前唐王朝对吐蕃的军事对策——以陇右节度为中心》，第 31 页。杨长玉在讨论唐朝西部疆域的变化时，也注意到了郭元振长安年间在凉州、陇右拓境之事，并注意到了唐朝势力的发展与吐蕃内乱有关，但讨论比较简略，对吐蕃内乱对唐蕃边境的影响以及郭元振西进至青海湖的意义等问题都未注意，参见杨长玉：《唐西部疆域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193—194 页。

⑤ 《新唐书》卷 4《则天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⑥ 《资治通鉴》卷 205“万岁通天元年正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6504 页。

⑦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 1，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98 页。Brandon Dotson 的翻译与王尧近似，译为“虎口汉人坟”，参见 Brandon Dotson, *The Old Tubo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ubo's First History*,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p. 99。黄布凡、马德则译为“索罗汗山唐人坟”，参见黄布凡、马德：《敦煌古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44 页。

关于此战的诸多细节。<sup>①</sup> 文书提到论钦陵的身份是青海道将军,<sup>②</sup> 这里的青海道应即吐蕃此前设立的青海大行军衙,<sup>③</sup> 论钦陵应是率领青海行军衙的军队从北向南进攻洮州。王孝杰在致论钦陵的信中提到:“吐蕃在虎关隘、牦牛关隘之军旅数吾亦相当……吐蕃能聚集之大军,吾仅发克蕃之兵丁亦有如是之数”。论钦陵亦提到:“你们之军旅实如湖上之蝇群,为数甚多”。<sup>④</sup> 据此,王孝杰此次出征应集结了大量的军队,从文书后文所言“杀十万众”<sup>⑤</sup> 看,唐军数量已与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相当,<sup>⑥</sup> 唐军对此战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吐蕃方面的兵力不仅与唐军相当,吐蕃经营陇右的两个最重要将领——论钦陵、赞婆也同时参战,<sup>⑦</sup> 足见吐蕃对此战也非常看重。吐蕃侵扰洮州后,武则天立即派遣在西域接连战胜吐蕃的王孝杰率军救援,这说明吐蕃在最初进攻洮州时就已集中了重兵,且已威胁到了唐朝。换言之,洮州一带一开始就已成为吐蕃的战略目标,洮州之战实际上是青海之战后,唐蕃在陇右的又一场大战。<sup>⑧</sup> 那么,唐蕃为何会在洮州爆发大战呢?

据 P. T. 1287,王孝杰是“越境”,即从唐朝控制区进入吐蕃控制区后,才率军与论钦陵对峙的,且战争开始后,达拉山(素罗汗山)与黄河河畔都有大量的唐军阵亡,<sup>⑨</sup> 可知洮州之战的战场并不局限于洮州境内,洮州以西的吐蕃控制区以及黄河河畔也是双方交战的重要场地,而这一区域正是唐蕃反复争夺的黄河九曲之地。黄河在流经今玛曲县时,因从北流转为了西北流,故在玛曲至共和之间形成了一段大致为东南—西北—东北走向的河段,这一蜿蜒河段的以东地区也由此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河曲地区,因位于黄河以东,故这片地区在史籍中被称为黄河九曲,<sup>⑩</sup> 其地大致包括今青海省黄南、海南两州大部以及甘肃省的甘南、临夏两州部分区域(参见图1)。从黄河九曲往北可进入河西九曲,<sup>⑪</sup> 青海湖、大非川等要地,往东可进入陇右诸州,往南则可进入剑南,<sup>⑫</sup> 在洮州之战爆发前,唐蕃即已围绕这一交通要地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和青海湖、赤岭一样,

① 关于 P. T. 1287 第 15 节所载的唐蕃双方将领的战前对话,朱丽双认为原本是论钦陵与郭元振的谈判辩论,后因历史久远,逐渐偏离事实,变成了论钦陵与王孝杰的对话,这一对话仅是空泛的文字游戏,应是出于后人的创作。参见朱丽双:《历史与记忆: P. T. 1287 第 15 节新探》,《中国藏学》2019 年第 2 期。岩尾一史认为论钦陵与王孝杰阵前对话一事可能是虚构的,但文书所载战争的结果却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参见岩尾一史:《ドルボ考:チベット帝国支配下の非チベット人集団》,《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 31 号,2016 年,第 2 页。笔者赞同岩尾一史的看法,即这一段出自后人创作的对话确实有部分虚构,但不能否认其中也含有真实信息。从《通典》所载郭元振与论钦陵的对话看(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 190《边防六·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173—5177 页),二人谈的主要是唐蕃的疆界划分,郭元振前往吐蕃,也并未携带大军,这与 P. T. 1287 所载的双方互相炫耀兵力以及唐蕃大战的内容明显不符。综合来看, P. T. 1287 所载论钦陵与王孝杰的对话以及相关史事应是在具体史实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其史料价值不宜低估。

②③④⑤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 1,第 244、195、245、246 页。

⑥ 大非川之战,唐廷命薛仁贵“率众十余万以讨之”(《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青海之战“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资治通鉴》卷 202“仪凤三年九月丙寅”条,第 6385 页)。

⑦ 《资治通鉴》卷 205“万岁通天元年三月壬寅”条,第 6504 页。

⑧ 陈楠将素罗汗山之战(洮州之战)与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并称为“三次青海之战”,并认为洮州之战的规模比前两次大战都要大,参见陈楠:《公元七世纪中后期唐、蕃对吐谷浑的争夺》,见陈楠:《藏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102—108 页。陈楠虽注意到了洮州之战规模很大,但对于洮州之战爆发的背景及意义并未深究。

⑨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 1,第 246 页。另参黄布凡、马德:《敦煌古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 273 页。

⑩ 天宝十三载(754),哥舒翰“以前年之役收黄河九曲之地,请分置郡县及军,于是新置洮阳郡及神策军于临洮郡之西二百里,洮河郡于〔积〕石军之西百里及宛秀军,以实河曲之地”(《册府元龟》卷 429《将帅部·拓土》,第 5117 页上栏),临洮郡即洮州,洮阳郡及神策军均在洮州以西,积石军以西的洮河郡、宛秀军则在距离积石军不远的黄河,可知此处的哥舒翰收复的黄河九曲指的是南到洮州,北到黄河的广大区域。现代学者也对黄河九曲的范围做了讨论,刘满认为九曲指的是“今甘肃玛曲以下到青海贵南县龙羊峡这一段黄河东岸的一大片土地”,参见刘满:《唐九曲及其相关军城镇戍考》,《敦煌学辑刊》2010 年第 2 期;杨长玉认为九曲的范围包括“黄河上游自今玛多县至共和县之间的河段所流经的地带”,参见杨长玉:《唐蕃接触中的河西九曲》,《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二人所言的九曲即黄河九曲,玛多县河段虽也曲折,但并不在哥舒翰所言的黄河九曲范围内,应予排除,相比之下,刘满的观点要更为合理,只不过龙羊峡河段并不只在贵南县境内,还流经共和县,因此,黄河九曲的范围还是确定为玛曲至共和河段的黄河流经区较为妥当。

⑪ 河西九曲与黄河九曲并非一地,关于二者的差异可参见后文讨论。

⑫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4 卷《山剑滇黔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969—973 页。

黄河九曲事实上也是唐蕃在陇右的另一个重要战场。<sup>①</sup> 然而，由于高宗时期的数次唐蕃大战均爆发于大非川、青海湖、赤岭一线，故在洮州之战前，学界对远离唐蕃主战场的黄河九曲其实并没有太多关注，对活跃于此的诸部落在唐蕃竞争中的地位以及唐蕃此前的黄河九曲争夺历程，我们也同样不清楚。要理解洮州之战爆发的背景及意义，我们需要先解决上述疑问，以便重新揭示黄河九曲在唐蕃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图 1 黄河九曲、河西九曲位置示意图

说明：本图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第 5 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陇右道”图改绘而成

在吐蕃东进前，黄河九曲分布的主要是党项和吐谷浑部落。党项的分布较为广泛，“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sup>②</sup> 而黄河九曲正是位于诸羌与吐谷浑之间。在隋唐时期的史籍中，还留下了不少与黄河九曲的党项部落相关的记录。隋开皇五年（585），党项“拓跋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sup>③</sup> 旭州就在洮州境内，<sup>④</sup> 武德五年（622），唐朝在叠州“以党项户置安化、和同二县”。<sup>⑤</sup> 唐初，党项部落还单独或联合吐谷浑多次侵扰河、渭、岷、廓诸州，<sup>⑥</sup> 洮、叠等诸州以西正是黄河九曲地区，这些党项部落应即出自黄河九曲。若进一步分析，则可以发现唐初黄河九曲的党项部落有很大可能是出自拓跋赤辞部。党项大酋拓跋赤辞未归附唐朝时，“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谕以祸福”，岷州都督刘师立、李道彦也先后“遣人招诱”，<sup>⑦</sup> 廓州、岷州都督先后派人招降，说明拓跋赤辞部离二州并不远。贞观九年

① 李宗俊也认为洮州及其以西的黄河九曲地区具有重要的交通、战略价值，唐蕃在此地曾展开过数次争夺，参见李宗俊：《唐代石堡城、赤岭位置及唐蕃古道再考》，《民族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笔者虽同意李文对洮州及黄河九曲战略地位的判断，但李文由于将石堡城和赤岭均定在了洮州境内且未区分黄河九曲和河西九曲，故对史料的解读存在一定问题。

②⑦ 《旧唐书》卷 198《党项传》。

③ 《隋书》卷 83《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④ 《隋书》卷 29《地理志上·临洮郡》。

⑤ 《新唐书》卷 40《地理志四·陇右道》。

⑥ 分别参见《资治通鉴》卷 190“武德六年六月庚寅”条（第 5967 页）、卷 191“武德八年四月乙亥”条（第 5995 页）、卷 191“武德九年三月癸巳”条（第 6000 页）、卷 191“武德九年五月壬辰”条（第 6003 页）。

(635),唐朝征讨吐谷浑时,以“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sup>①</sup>赤水即今共和县境内的恰不恰河,<sup>②</sup>从行军名称看,李道彦的任务是从岷州出发,一路往北进至赤水地。在出发前,唐朝曾“复厚币遗党项令为乡导”,<sup>③</sup>希望借道拓跋赤辞部,可知拓跋赤辞部正好处在从岷州北上赤水的道路上,而这一区域正是黄河九曲地区。综合以上证据,我们有理由认为唐初占据黄河九曲的主要是党项拓跋赤辞部。

吐谷浑分布在“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sup>④</sup>而在如此广大的控制区内,隋唐时期吐谷浑的活动重心主要是在黄河九曲以北的赤水域及青海湖周边区域,<sup>⑤</sup>吐谷浑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曼头、树敦、伏俟诸城均位于这一地域内,<sup>⑥</sup>吐谷浑正是以此区域为中心而不断南下北上的。吐谷浑由于政治中心在黄河九曲以北,故在进攻与黄河九曲相接的陇右各州时,经常需要借助党项的力量,武德年间二者就曾数次联合进攻洮、廓等州。双方的联合不仅见于唐初,也见于隋,<sup>⑦</sup>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北周。<sup>⑧</sup>吐谷浑和党项事实上形成了同盟,二者互相支援,共同对抗中原王朝,由于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党项的首领甚至被称为“浑项王”。<sup>⑨</sup>拓跋赤辞之所以“甚为浑主伏允所昵,与之结婚”,<sup>⑩</sup>就是因为伏允希望通过拓跋部而掌控黄河九曲之地,同样的,唐朝接连不断地遣使招揽拓跋赤辞,也是为了拆散吐谷浑和党项的联盟,减少进攻吐谷浑的阻力。不唯唐朝如此,大业年间隋朝进攻吐谷浑前也是首先收服了拓跋

①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

② 关于赤水的位置,素有争议,相关观点的梳理可参见秦裕江:《赤水与赤水戌——吐谷浑地理考察之二》,《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秦裕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赤水指的是今同德县河北乡到恰不恰河入黄河之间的一段黄河河段(114页),史料中对赤水与河有着严格的区分,二者恐难以等同。山口瑞凤和铃木隆一认为赤水指的是今共和县境内的沙珠玉河(铃木隆一:《吐谷浑与吐蕃之河西九曲》,钟美珠译,《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但沙珠玉河所在的切吉旷原普遍被认为是大非川所在区域,沙珠玉河更可能是大非河,因此二人的观点也难以成立。关于大非川地理位置的研究史梳理及最新考证,可参见刘子凡:《2017年度“唐蕃古道”国情调研纪要》,见《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66—370页。除以上观点外,佐藤长提出赤水即乌兰布拉克河,周伟洲认为赤水为今恰不恰河,两河均指从共和县注入黄河的同一条河流,只是译名不同,参见佐藤长:《再论“河西九曲”之地》,张铁纲译,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页;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页。张开对“赤水”的所指又做了新研究,他认为赤水在不同时期的所指并不相同,隋唐时期的赤水应是发源于赤岭,最后从西南流入尕斯库勒湖的一条流程较短的河流,吐蕃求“赤水地”是因为赤水处于进出青藏高原的咽喉要道,参见张开:《吐谷浑“赤水”及吐蕃求“赤水地”考辨》,《中国藏学》2023年第4期。赤水在隋唐时期的数次大战中均被当做了重要战略目标,若赤水仅是一条较小河流,恐不至于引起多方势力的争夺,麟德二年吐蕃求“赤水地以为牧野”(《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第11721页下栏),也可说明赤水应是在一片面积较大、牧草茂盛的区域。共和县境内的恰不恰河流域,不仅面积较大,水草丰美,且同样处在交通要道上,时至今日仍是海南州及共和县的行政中心所在地(恰卜恰镇),相比之下,笔者还是认为佐藤长、周伟洲提出的恰不恰河说更为合理。

③ 《旧唐书》卷60《李孝逸传》。

④ 《隋书》卷83《吐谷浑传》。

⑤ 铃木隆一:《吐谷浑与吐蕃之河西九曲》,钟美珠译,《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佐藤长:《再论“河西九曲”之地》,张铁纲译,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第47页。牛敬飞对吐谷浑政治中心的迁徙做过系统研究,他认为吐谷浑最初主要活动于洮河流域,此后在北魏的压力下,被迫西迁到了与青海湖相近的伏罗川一带,他还进一步指出伏罗川在今天的都兰县境内,参见牛敬飞:《论吐谷浑早期的活动范围及战略转移》,《学术月刊》2022年第6期。

⑥ 曼头城在今共和县境内,参见牛敬飞:《论吐谷浑早期的活动范围及战略转移》,《学术月刊》2022年第6期。唐代的廓州“西至吐蕃界树郭城三百二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廓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3页),树郭城即树墩城之误,据此可知,树墩城在廓州西不远处。严耕望认为树墩城在今共和县倒淌河流域,陈良伟认为在共和县曲沟古城,具体地点虽有争议,但两位学者均认为树墩城在共和县境内,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6—537页;陈良伟:《丝绸之路青海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伏俟城即青海湖西南的铁卜卡古城,参见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

⑦ 《隋书》卷40《元谐传》载:“时贼将定城王钟利房率骑三千渡河,连结党项。潜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归路。”从元谐至青海湖截住钟利房归路看,钟利房应是从北往南越过黄河,进到党项之地的,此处的党项也应分布于黄河九曲。

⑧ “(保定)四年,王师东讨,朝议以西道空虚,虑羌、浑侵扰,乃授(李)贤使持节、河州总管、三州七防诸军事、河州刺史……改授贤洮州总管、七防诸军事,洮州刺史……羌复引吐谷浑数千骑,将入西疆。贤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复大败之。”(《周书》卷25《李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所谓羌、浑,即羌和吐谷浑,此处的羌活跃于河州、洮州一带,与此后的党项活动范围相同,入寇各州的羌中当有不少是党项。

⑨ 段志凌、吕永前:《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拔氏源于鲜卑新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1期。

⑩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赤辞部，打开了北上进攻吐谷浑的通道。<sup>①</sup> 无论是隋朝、唐朝，还是吐谷浑，不同势力间对党项部落的竞相招揽实质上就是为了争夺黄河九曲的控制权，要击败吐谷浑，必须先控制黄河九曲的党项部落，这已成为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共识。

贞观五年（631）拓跋赤辞归附后，唐朝“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羁縻存抚之”，<sup>②</sup> 这三十二州虽隶属松州都督府，但大部分羁縻州应位于黄河九曲之地。<sup>③</sup> 加上此前李世南开辟的“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sup>④</sup> 到了贞观六年年底时，“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sup>⑤</sup> 随着党项部落的大规模降附，“从河首大碛石山已东，并为中国之境”。<sup>⑥</sup> 大碛（积）石山即今阿尼玛卿山，<sup>⑦</sup> 阿尼玛卿山以东正是黄河九曲，可知在贞观六年时九曲之地已转归唐朝所有，吐谷浑则因为失去了对黄河九曲和党项部落的控制，贞观五年后其攻唐方向也被迫北移到了兰州、凉州等地，<sup>⑧</sup> 在与唐朝的较量中，吐谷浑已处于劣势地位。贞观九年，唐朝击败吐谷浑后，吐谷浑“举国内属”，党项则“自此职贡不绝”，<sup>⑨</sup> 吐谷浑和党项之地都被唐朝所控制，唐朝势力在陇右达到极盛。

进入显庆年间后，吐蕃开始东进与唐朝争夺吐谷浑、党项之地，黄河九曲也逐渐转归吐蕃控制。显庆元年（656）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sup>⑩</sup> 此处的白兰即位于今四川西北部的南部白兰。<sup>⑪</sup> 随后，生活在阿尼玛卿山下的雪山党项“及白狗、春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已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sup>⑫</sup> 乾封二年（667）“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罢之”，<sup>⑬</sup> 吐蕃势力已从剑南、吐谷浑故地两个方向南北夹击，同时逼近黄河九曲。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之战后，唐朝进一步丧失了对青海湖以南区域的控制，吐谷浑复国无望，吐蕃势力开始进入黄河九曲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黄河九曲南部也遭到了吐蕃的进攻，上元二年（675），芳州常芬县陷蕃，<sup>⑭</sup> 次年“闰三月，吐蕃入寇鄯、廓、河、芳等州”，<sup>⑮</sup> 五月廓州再次遭到吐蕃袭扰，<sup>⑯</sup> 八月“乙未，吐蕃寇叠州”，<sup>⑰</sup> 同年，安置党项部落的洮州密恭县陷蕃，<sup>⑱</sup> 黄河九曲附近的陇右各州均已处在吐蕃兵锋之下。到了永隆元年（680），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sup>⑲</sup> 至迟

① 党项首领拓跋赤辞提到“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旧唐书》卷60《李道彦传》），可知，隋朝进攻吐谷浑前，已经收复了拓跋赤辞部。大业五年，周法尚“从讨吐谷浑，法尚别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隋书》卷65《周法尚传》），周法尚从松州北上至青海湖，也需要经过黄河九曲，拓跋赤辞所言的隋人，或即周法尚部。

②⑥ 《唐会要》卷98《党项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082、2082—2083页。

③ 这些羁縻州之所以会隶属于松州都督府，应与松州都督府此时的军事地位有关。武德中，“窦轨为益州道行台左仆射，击临洮羌，破其部众。轨度羌胡终为后患，于松州置屯田，以备后举”（《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第6036页上栏），临洮即洮州，窦轨率军进至临洮，却又在松州屯田，这说明松州才是北上进攻黄河九曲的基地。贞观九年，赤水道总管李道彦从岷州北上途中，遭遇党项背叛，只得“退保松州”（《旧唐书》卷60《李道彦传》），也可说明松州的重要地位。郭声波曾对九曲的党项羁縻州做过研究，并比定出了这些羁縻州的方位，参见郭声波：《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府州及相关问题研究》，见《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72页，郭文所说的河西九曲即本文的黄河九曲。

④ 《册府元龟》卷429《将帅部·拓土》，第5116页下栏。关于这十六州，可参见郭声波：《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见《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210页。

⑤ 《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降附》，第11480页上栏。

⑦ 汤开建：《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考辨》，见《党项西夏史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6—77页。

⑧ 《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条，第6095页；《新唐书》卷2《太宗纪》。

⑨⑫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⑩ 《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11687页上栏。

⑪ 胡康：《从河源到赤岭——论唐高宗时期吐蕃在陇右的东扩》，见《唐研究》第28卷，第574页。

⑬ 《资治通鉴》卷201“乾封二年三月戊寅”条，第6351页。

⑭ 《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陇右道》。

⑮ 《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第五》，第11580页上栏。

⑯ 《皇甫武墓志》载：“上元三年五月，奉敕使廓州静边镇防守。城隍靡设，边土护安。捍御无施，凶徒殄绝”，可知，此年五月后，廓州再次遭到了吐蕃的侵扰。墓志录文参见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风引雍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⑰ 《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⑱ 《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陇右道》。

⑲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在此时，黄河九曲就应彻底落入吐蕃之手。原先聚居于黄河九曲的党项部落除一部分东迁到了唐朝境内外，<sup>①</sup>大部分都留在了原地，“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sup>②</sup>成为吐蕃进攻唐朝的重要帮手。永淳二年（683），镇守鄯州的黑齿常之即“奏讨三曲党项”，<sup>③</sup>从名称看，三曲党项很可能就来自黄河九曲。

青海之战后，唐蕃的主要对抗区域转到了湟水流域和青海湖东岸，<sup>④</sup>南部的陇右各州虽时常受到吐蕃侵扰，<sup>⑤</sup>但一直未发生大的战争，直到天授三年（692）大量党项部落降唐，原先的平静局面才被打破。《旧唐书·党项传》载：“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sup>⑥</sup>《资治通鉴》则载：“（长寿元年）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sup>⑦</sup>两处记载都提到了党项部落内附后设置十州事，但对于内附部落数量的记载则存在差异。天授三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长寿，二月党项部落降附时还是天授三年，从史料本身的性质考虑，《旧唐书》的记载应更为原始。对于党项降唐事，《新唐书·吐蕃传》载：“大首领曷苏率贵川部与党项种三十万降”，<sup>⑧</sup>此段记载虽将党项与曷苏降唐事混在了一起，<sup>⑨</sup>但在降人数量上却有力地支持了《旧唐书》的记载。综合上述两点，此次降唐的党项部落应为二十万口，<sup>⑩</sup>《通鉴》或因裁剪史料而致误。

不过，《通鉴》所载的“吐蕃党项部落”还是提供了关于这批党项降人的关键信息，从这一记载可知，此次降唐的部落是原先吐蕃控制下的党项部落。根据“其地”以及分置十州的记载，这批党项部落最初归附时是被安置在原地的，所谓“散居灵、夏等界”<sup>⑪</sup>描述的其实是这批党项部落此后内徙的景象。<sup>⑫</sup>贞观六年时，前后降附唐朝的党项降人达三十万口，长寿元年降唐的党项部落，数量虽不及贞观年间，但自贞观之后，唐朝还未接纳过如此数量的党项降人。与汉文史料互为印证，吐蕃历史文书也记载了诸部落对吐蕃的背叛，据 P. T. 1287，洮州之战后，“自阿若卜以远，娘……道尔保等地王子与庶民均已收抚，归为编氓。并建五道守卫大使。廓州等北方与南方众多小邦亦收归治下，抚为编氓”。<sup>⑬</sup>道尔保（Dor po）在古藏文文书中多有出

① 咸亨三年（672）“九月，置静州以处内附党项部落”（《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第2052页下栏），到了仪凤元年（676），吐蕃对陇右的侵扰更加频繁，内徙部落也更多，“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置静边等州以处之”（《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拓跋守寂墓志》也载“迨仪凤年，公之高祖立伽府君，委质为臣，率众内属……拜大将军、兼十八州部落使。徙居固阴之地，则今之静边府也”（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拓跋守寂墓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从《旧唐书·党项传》的前后叙述看，内徙的静边州拓跋部应来自拓跋赤辞家族，在吐蕃的侵逼之下，原先占据黄河九曲的拓跋赤辞家族很可能也离开了故地。

②⑥⑪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 张鹭撰，赵守俨点校：《朝野金载》卷6，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5页。从后文的“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看，黑齿常之讨党项在李谨行去世前后，而据《李谨行墓志》，李谨行卒于永淳二年（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李谨行墓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可知黑齿常之讨三曲党项在永淳二年。

④ 胡康：《从河源到赤岭——论唐高宗时期吐蕃在陇右的东扩》，见《唐研究》第28卷，第590—597页。

⑤ 《殷平墓志》载：“光宅之后，频殄西蕃，授右监门卫将军、积石军经略大使、检校廓州刺史兼知营田事”（赵文成、赵君平编：《新出唐墓志百种》，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68页），可知光宅年间，唐朝和吐蕃在廓州一带曾多次发生冲突，不过，这些冲突的规模都比较小。

⑦ 《资治通鉴》卷205“长寿元年二月”条，第6482页。

⑧ 《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

⑨ 按照《通鉴》的记载，党项部落在长寿元年二月己亥时已分置十州，则其降附时间应在二月之前，曷苏部落请求内附则在二月之后，且六月唐朝才正式派兵接纳（《资治通鉴》卷205“长寿元年六月”条，第6482页），从时间上看，党项与曷苏部落应是分别降唐的。张玄遇率军至大渡水方向迎接曷苏，而大渡水不远处即是黎州、雅州，曷苏部落或即在黎州、雅州以西的吐蕃境内。党项部落虽分布极广，但无论是黎州，还是雅州以西的吐蕃之地，都离党项故地很远，从地理位置看，党项部落归属曷苏的可能性很小。不管是从时间，还是从地理角度考虑，党项与曷苏部落都不可能是同时降唐的，《新唐书·吐蕃传》或因二者降附时间较为接近而误将党项视为了曷苏部下。

⑩ 《新唐书》所载的三十万，包含了曷苏部落与党项，将二者分开，党项部落应仍是二十万。

⑫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陇右道》载：“肃宗时懿、盖、嵯、诺、嶂、祐、台、桥、浮、宝、玉、位、儒、归、恤及西戎、西沧、乐容、归德等州皆内徙，余皆没于吐蕃。”郭声波已经指出，这段史料是指到肃宗时为止，诸羁縻州都已内迁，而不是指肃宗时代这些羁縻州才内迁，参见郭声波：《唐代河西九曲羁縻府州及相关问题》，见《历史地理》第21辑，第62页。这些内徙的羁縻州中就有桥、浮、归三州，这三州的党项部落应是在洮州之战后才内徙到关内道的。

⑬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第246页。

现,指的是洮州羌,<sup>①</sup>从文书中出现的廓州以及上引 P. T. 1287 所言唐蕃在洮州附近的黄河河畔爆发大战看,这些背叛吐蕃的部落、小邦应主要分布在黄河九曲。吐蕃此前就已控制了黄河九曲,此时却又将各地王子、庶民、小邦收归治下,这说明在洮州之战前,文书中提到的诸部落、小邦很可能已背叛吐蕃。结合汉文史料中党项大规模降唐的记载以及藏文文书中明确出现的洮州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些叛蕃部落的主体确定为黄河九曲的党项。如前文所言,党项是这一地区的主要部族,贞观六年三十万党项降唐后,唐朝即已控制了积石山以东地区,则天授三年,在广泛分布于从廓州到洮州一带的二十万党项部落降唐后,唐朝也应控制了黄河九曲的大部分地区,吐蕃在该区域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已被严重动摇。

此时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党项部落降唐,大概与吐蕃正奋力和唐朝争夺四镇,<sup>②</sup>难以顾及陇右,唐朝又趁机招揽党项部落有关。<sup>③</sup>党项部落降唐之时,由于西域战场的牵制,吐蕃并未立即出兵镇压。长寿元年(692)十月,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四镇,延载元年(694)二月,王孝杰、韩思忠又在冷泉、碎叶大破吐蕃数万人,<sup>④</sup>吐蕃收复西域的计划最终宣告失败,此后,四镇再未易手,唐蕃的角逐区域又回到了南线的陇右。长寿二年,论钦陵回到了吐谷浑,<sup>⑤</sup>这标志着西域受挫后,吐蕃将重心放到了陇右,开始着手处理党项问题。唐朝也意识到吐蕃接下来会在陇右发动军事进攻,也提前做了准备,次年一月,武则天以娄师德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sup>⑥</sup>娄师德曾长期驻守鄯州,“与虏战白水涧,八遇八克”,<sup>⑦</sup>甚至吐蕃都“为之数年不犯边”,<sup>⑧</sup>正是在黑齿常之和娄师德的努力下,唐朝才扭转了仪凤三年青海之战的颓势,在陇右重新站稳脚跟。长寿二年,娄师德拜相,<sup>⑨</sup>武则天在娄师德拜相不久就让其再次出镇陇右,应该与论钦陵在吐谷浑之地的活动有关,四镇争夺战结束后,唐蕃双方已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到了陇右。

经过上述分析后,我们就可以发现,洮州之战的爆发实际上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战争不仅牵涉到唐蕃双方,也涉及党项部落。早在战争爆发前的三年,由于党项部落的大量降唐,唐蕃在黄河九曲的地位早已易位了,论钦陵率领大军从青海行军衙一路南下进至洮州,实际上是为了镇压党项叛乱,重新恢复吐蕃对黄河九曲的统治。武则天之所以接连派出大军,对洮州之战如此重视,正是为了守住此前经营黄河九曲的成果,阻止吐蕃势力再次复兴,洮州之战本质上是唐蕃对黄河九曲、党项部落的争夺。但王孝杰在西域战场上的辉煌并没有在洮州重现,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王孝杰、娄师德及吐蕃战于素罗汗山,败绩”,<sup>⑩</sup>洮州之战最终以唐朝失败而告终,而此前内附唐朝的党项部落除部分内徙外,大部分应都被吐蕃重新控制,吐蕃也

① 王尧将道尔保译为地名,黄布凡、马德亦认为是地名(黄布凡、马德:《敦煌古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275页),后岩尾一史又综合各类史料,对道尔保做了重新解读,最终确认道尔保应与洮州羌有关,参见岩尾一史:《ドルボ考:チベット帝国支配下の非チベット人集团》,《内陆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31号,2016年,第16页。

② 关于垂拱到长寿年间的西域形势,可参见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98—218页。

③ 垂拱年间西域形势对唐朝不利之时,武则天也曾把目光转向南线。垂拱四年(688),“太后欲发梁、凤、巴蛮,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资治通鉴》卷204“垂拱四年”条,第6455页)。与高宗时期就已降附吐蕃的当、悉等州诸羌部落不同,“雅之边羌,自国初已来,未尝一日为盗”(陈子昂:《陈子昂集》卷9《谏雅州讨生羌书》,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01页)。在唐朝与吐蕃两大势力之间,雅州边羌事实上维持了两属状态,正是由于雅州边羌的存在,吐蕃才未能进一步东进。若贸然出击生羌,势必会造成“撤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向导以攻边,是乃借寇兵而为贼除道”(上引《陈子昂集》,第202页)的反作用。武则天此次不惜以攻击素来顺服的生羌为代价也要进攻吐蕃,正是西域形势恶化后,试图从南线威胁吐蕃的反映,而大量党项部落降唐的背后,应该也与武则天的南线经营有关。此外,考虑到此次降唐的党项部落数量巨大,则党项与吐蕃之间应早有积怨,很可能是吐蕃对党项征发过度后,党项才倒向唐朝的。

④ 《资治通鉴》卷205“延载元年二月”条,第6493页。关于长寿元年及之后的唐蕃西域竞争,可参看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0—118页。

⑤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第198页。

⑥ 《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旧传不载时间,据《新唐书》卷4《则天后纪》:“(延载元年)一月甲午,娄师德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营田大使。”可知娄师德外镇时间在延载元年一月。

⑦ 《新唐书》卷108《娄师德传》。

⑧ 《资治通鉴》卷202“仪凤三年九月丙寅”条,第6386页。

⑨ 《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

⑩ 《新唐书》卷4《则天后纪》。

再次占据了黄河九曲之地。

洮州之战结束后，论钦陵乘胜提出与唐朝划分势力范围，要求唐朝在四镇“拔去镇守”，使西域诸国“既不款汉，又不属蕃”，<sup>①</sup>即将西域作为唐蕃缓冲区。<sup>②</sup>唐朝的条件则是“必实无东侵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sup>③</sup>这里的吐浑诸部、青海故地泛指原先吐谷浑的控制区，刚被吐蕃重新控制的黄河九曲以及党项部落也包含在内。从唐朝提出的这一条件看，武则天对先前一度取得的成果并不愿轻易放弃。但无论是四镇，还是吐谷浑故地，唐蕃双方都不可能舍弃，这次划界最终以失败告终。为了报复唐朝，圣历元年（698），论钦陵又发动了对鄯州和湟水上游地区的进攻，<sup>④</sup>但由于唐朝提前做好了准备，故“钦陵入寇，果无功，由是得罪于其国”。<sup>⑤</sup>此时唐蕃的争夺焦点已经从西域转移到了陇右，且吐蕃在陇右已占据了优势地位，论钦陵此后若连续发动进攻，则唐朝的处境势必更趋恶化，然而，不久之后论钦陵的被杀，不仅使陇右摆脱了吐蕃的威胁，还让唐朝有了越过赤岭，重新控制河西九曲的机会。

## 二、吐蕃内乱与唐蕃陇右形势的逆转

论钦陵攻唐的次年，吐蕃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旧唐书·吐蕃传》载：

其赞普器弩悉弄年渐长，乃与其大臣论岩等密图之。时钦陵在外，赞普乃佯言将猎，召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人，杀之。发使召钦陵、赞婆等，钦陵举兵不受召，赞普自帅众讨之，钦陵未战而溃，遂自杀，其亲信左右同日自杀者百余人。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来降。<sup>⑥</sup>

赞婆投唐在圣历二年（699）四月，赞普诛杀论钦陵亲信后，论钦陵与赞婆举兵反抗，赞婆四月投唐前已举兵抵抗了一段时间，最后才因论钦陵自杀而降唐。论钦陵的自杀与赞婆的降唐，标志着专权四十余年的噶尔家族最终在吐蕃政治舞台上谢幕，这一内乱不仅对吐蕃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唐蕃边境局势的演变。要探究圣历二年后的唐蕃边境形势，我们还需要从噶尔家族与吐谷浑之地的关系谈起。旗手瞳详细讨论了噶尔家族与吐蕃经营吐谷浑的关系，其观点可大致概括如下：（一）吐蕃征服吐谷浑，以及之后在吐谷浑的军事活动全部是由噶尔家族承担的；（二）噶尔家族经营吐谷浑时期，吐谷浑之地是吐蕃重要的军事据点；（三）长期经营吐谷浑的噶尔家族被肃清，导致了吐谷浑部落的大规模降唐，吐蕃的吐谷浑统治因此陷入危机。<sup>⑦</sup>以上三个结论都是极敏锐的观察，笔者均赞同。不过，旗手瞳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噶尔家族上，对噶尔家族以外的吐谷浑故地诸部落与吐蕃经营吐谷浑之间的关系，以及噶尔家族被肃清事件对唐蕃边境形势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并未深入讨论。下面，笔者希望围绕这两个问题，对噶尔家族被肃清前后的唐蕃陇右形势再做一些探讨。

正如旗手瞳指出的那样，吐蕃对吐谷浑之地的经营一直以来都是由噶尔家族负责的，不过，噶尔家族经营吐谷浑所依靠的并不仅仅是吐蕃人，吐谷浑故地诸部落在其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的吐谷浑故地或吐谷浑之地，指的是吐谷浑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主要包括祁连山以南的今柴达木盆地以及北到鄯州，南到松州的广大地区，上文讨论的黄河九曲也在这一范围内。除吐谷浑外，这片地区的主要部落还有党项、白兰，这一地区远离吐蕃本土，吐蕃要经营吐谷浑之地，毫无疑问需要依靠这些部落的配合，而这些部落也在唐蕃的陇右角逐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党项部落的重要地位，上文已有揭示，此处想重点讨论的是白兰

①③ 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蕃》，第5174、5176页。

② 吴玉贵：《吐蕃“求分十姓突厥之地”辨误》，见《西暨流沙——隋唐突厥西域历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84—195页。

④ 《大事纪年》载：“大论钦陵引兵赴大小宗喀，执唐军元帅都护使”（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第199页），大宗喀在湟水下游鄯州一带，小宗喀则是湟水上游一带，参见黄布凡、马德：《敦煌古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97页。另参叶拉太：《敦煌古藏文文书所见多康地区部分吐蕃古地名考释》，见《西北民族论丛》第1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4—165页。

⑤ 《资治通鉴》卷205“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丁巳”条，《考异》引《御史台记》，第6509页。

⑥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⑦ 旗手瞳：《7~9世纪吐蕃支配下的吐谷浑》，大阪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32—42页。这部分内容在博士论文完成前，即以《吐蕃による吐谷渾支配とガル氏》为名，单独发表于《史学雑誌》第123卷第1号，2014年，第38—53页。

和吐谷浑。

白兰部落分布极广，长孙仁在大业年间征讨吐谷浑时，“扬麾于青海之滨，大剪白兰之丑”，<sup>①</sup>可知青海湖附近分布着大量的白兰部落。李思谅在显庆年间出使吐蕃时，曾路经吐谷浑之地，其墓志提到“盐海际天，苍山蔽日。羌戎之地，杂种寔繁；白兰之南，荐居非一。绵亘恃险，亟多翻叛”。<sup>②</sup>盐海即青海湖，此时吐谷浑之地还在唐朝控制下，从墓志看，白兰部落依然大量聚集在青海湖周边，且已有叛唐之兆。贞观十二年（638），吐蕃松赞干布“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sup>③</sup>可知松州西也是白兰部落的分布地。北至青海湖，南至松州的广大区域均有白兰部落分布，<sup>④</sup>正因为白兰分布广泛，吐谷浑才能多次退保白兰。<sup>⑤</sup>白兰部落不仅数量众多，战斗力也很强，显庆元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sup>⑥</sup>吐蕃以十二万之众苦战三日，却才杀白兰千余人，此后还只能屯兵境上，慢慢蚕食，白兰战斗力之强于此可见。白兰被吐蕃征服后，“收其兵以为军锋”，<sup>⑦</sup>白兰部落亦成为吐蕃军队的组成部分。此后虽无白兰活动的记载，但《逮府君墓志》所载的“隶大总管裴公，北伐匈奴。白兰之围数重，青海之兵四合，所向无坚敌，所攻无全阵”<sup>⑧</sup>还是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墓志记述了逮府君随裴行俭讨伐突厥事，白兰、青海显然与突厥无关，墓志提到白兰、青海主要是为了衬托墓主的功业，这从侧面说明白兰已成为此时唐朝在青海面临的主要敌人并广为人知，与党项一样，白兰也是吐蕃统治吐谷浑之地的重要依靠力量。

与长期保持部落分立形态的党项和白兰不同，吐谷浑曾建立过一个绵延数百年的强大游牧政权，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政治实力看，吐谷浑都可算是该区域内最为重要的部族，吐蕃要巩固对吐谷浑之地的控制，首要任务自然是强化与吐谷浑的关系。旗手瞳的研究也涉及吐蕃征服吐谷浑后对吐谷浑的统治，但其关注点主要在吐谷浑王室，<sup>⑨</sup>对吐谷浑部落在吐蕃对抗唐朝中的作用并未深究。吐蕃征服吐谷浑时，就充分借用了吐谷浑内部亲蕃派的力量。贞观十五年（641），吐谷浑丞相宣王“因欲袭击公主，劫诺曷钵奔于吐蕃”，<sup>⑩</sup>高宗时期则有“素和贵叛主奔走”，吐蕃“纳之，信其间隔，侵逼浑国，招其叛士，夺其土地”。<sup>⑪</sup>因为素和贵的投降，吐蕃才能尽知吐谷浑虚实，并招揽吐谷浑部落。素和贵此后长期驻守吐谷浑之地，调露二年（680）七月还与赞婆“率众三万进寇河源”，<sup>⑫</sup>成为吐蕃经营吐谷浑的重要帮手。除了素和贵，在《大事纪年》中还出现了达延莽布支、盆达延堀松两人。达延莽布支原为吐谷浑小王，在显庆四年曾率军在乌海与唐军大战。<sup>⑬</sup>“盆”在藏语中有外甥之意，不少学者认为盆达延堀松是吐谷浑人，<sup>⑭</sup>甚至可能是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王。<sup>⑮</sup>盆达延堀松在吐蕃政治中较为活跃，曾多次参与吐蕃集会议盟，噶尔·达古日耸、论钦陵等噶尔家族

①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长孙仁并夫人陆氏墓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481页。

②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③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④ 关于白兰的分布范围，可参见周伟洲：《白兰与多弥》，见周伟洲：《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5—41页。

⑤ 吐谷浑可汗叶延在去世前就曾对其子叶延说过：“吾气绝，棺敛讫，便远去保白兰。白兰地既险远，又土俗懦弱，易为控御”（《宋书》卷96《吐谷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保白兰已然成为吐谷浑的“国策”。

⑥ 《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第11687页上栏。

⑦ 《唐会要》卷98《白狗羌》，第2078页。

⑧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逮府君墓志》，第407页。

⑨ 旗手瞳：《7~9世纪吐蕃支配下の吐谷浑》，第31—33页。

⑩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

⑪ 《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才智》，第11322页下栏。

⑫ 《册府元龟》卷443《将帅部·败衄第三》，第5255页上栏。

⑬ 关于达延莽布支的身份及活动，可参见陈楠：《论噶尔家族专权时期吐蕃的内政建设及唐蕃关系》，《民族史研究》第1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5—117页。

⑭ 周伟洲：《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见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56—357页；陈践：《百慈藏卷〈吐蕃兵律〉语词新译》，《民族翻译》2020年第2期。沈琛新近撰文认为盆达延父子应出自青藏高原东部的小邦达布，而非吐谷浑，参见沈琛：《敦煌吐蕃兵律文书补考》，《文史》2022年第3辑。

⑮ 全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成员都先后与之会盟,<sup>①</sup> 这说明垒达延墀松不仅在吐蕃身居高位, 还与噶尔家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素和贵、达延莽布支、垒达延墀松都是吐谷浑人在吐蕃政治中的代表, 除了参与吐蕃政治, 吐谷浑人还是吐蕃各地驻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怀寂墓志》提到“此州(叠州)境邻浑寇, 地带山岩, 烽候屡惊, 草窃为弊。公虽职佐千里, 而微洞六奇, 设计运筹, 穷其巢穴”,<sup>②</sup> 叠州附近的吐谷浑部落正是吐蕃侵扰唐境的重要力量。《李思贞墓志》在叙述河源军的重要性时提到“河源重镇, 积石要冲, 扼浑戎之喉, 抚烧羌之背”,<sup>③</sup> 所谓浑戎即吐谷浑, 烧羌即烧当羌, 此处指党项, 在时人眼中, 吐谷浑和党项已然成为鄯州的重点防御对象。神功元年(697)的野狐河之会后, 郭元振在上书中明确提到“青海吐浑密迩兰、鄯, 比为汉患, 实在兹辈”,<sup>④</sup> 直接将吐谷浑部落视为了侵扰兰、鄯等州的最大祸患, 由此可知, 吐蕃在河湟的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吐谷浑部落的。

除了活跃于河湟, 吐谷浑部落还大量聚集在河西走廊以南的吐谷浑故地。载初元年(689)在敦煌当地流行的歌谣中就提到敦煌“地邻蕃服, 家接浑乡”,<sup>⑤</sup> 所谓“浑乡”, 即敦煌以南的吐谷浑聚居区。此后, 崔融进一步提到:“碛南有沙、瓜、甘、肃四州, 并以南山为限, 山南即吐浑及吐蕃部落”,<sup>⑥</sup> 是则沙、瓜、甘、肃四州以南均有吐谷浑部落。圣历二年, 凉、甘、肃、瓜、沙诸州均有吐谷浑降唐,<sup>⑦</sup> 这些降人应即崔融提到的南山以南的吐谷浑诸部落。在这些部落降唐前, 它们驻守吐谷浑故地, 是吐蕃进攻河西诸州的重要帮手。<sup>⑧</sup> S. 367《沙州伊州地志》载:“萨毗城, 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 康艳典所筑, 其城近萨毗泽, 山险阻, 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sup>⑨</sup> 萨毗城扼守从今柴达木盆地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要道, 其东就是吐谷浑故地, 该地直到晚唐都还有吐蕃、吐谷浑来往不绝, 则在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域时, 吐蕃、吐谷浑部落的数量想必会更多。吐蕃从东路进入西域, 吐谷浑在其中显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阿斯塔纳曾出土了一批圣历年间吐谷浑部落意欲前往沙州降唐的文书, 其中颇值得注意的是文书中提到了吐谷浑可汗, “(可汗)今口墨离川总欲投汉来”,<sup>⑩</sup> 从文书看, 该可汗应是驻于墨离川。<sup>⑪</sup> 墨离川在今祁连山以南的苏干湖、哈尔腾河一带,<sup>⑫</sup> 离瓜、沙二州很近, 是吐谷浑的重要活动中心, 《吐谷浑纪年》中就曾提到吐谷浑莫贺可汗曾在709—710年左右巡视此处。<sup>⑬</sup> 天宝年间, 王忠嗣“伐吐浑于墨离, 虏其全国而归”,<sup>⑭</sup> 墨离即墨离川, 从“全国”一语看, 墨离川当分布有大量的吐谷浑部落。在赤水川之外, 墨离川构成了吐谷

①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 第197—198页。

②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张怀寂墓志铭》,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9年, 第339页。

③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李思贞墓志铭》,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年, 第279页。

④ 《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

⑤⑨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58、242页。

⑥ 《文苑英华》卷769《拔四镇议》, 北京:中华书局, 1966年, 第4049页下栏。

⑦ 杜佑著,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谷浑》, 第5167页。

⑧ 《冯师训碑》即载:“(总章)二年, 加宣威将军, 守右监门卫中郎将, 敕于浑衙镇压, 并于兰、凉、鄯、廓、甘、瓜等州经略叛浑, 讨击山贼。公喻之以恩惠, 申之以威严。数岁之间, 晏然清恬。”(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冯师训碑》,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6年, 第6页)唐朝此时并未在甘、瓜二州安置吐谷浑部落, 此处的叛浑无疑来自祁连山以南的吐谷浑故地。

⑩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叁),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年, 第412页。

⑪ 关于这批文书的研究, 可参见齐东方:《吐鲁番阿斯塔纳225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兼论吐谷浑余部》, 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 第582—613页;荒川正晴:《唐の中央アジア支配と墨離の吐谷渾(上): トゥルファン・アスターナ出土の豆盧軍牒の検討を中心として》, 见《史滴》第9辑, 1988年, 第25—41页;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吐谷浑归朝案卷研究》, 见《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第498页。

⑫ 关于墨离川的所在, 可参见荒川正晴:《唐代河西の吐谷渾と墨離》, 见《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3辑, 1986年, 第51—54页;荒川正晴:《唐の中央アジア支配と墨離の吐谷渾(上): トゥルファン・アスターナ出土の豆盧軍牒の検討を中心として》, 见《史滴》第9辑, 第37页;旗手瞳:《7—9世紀吐蕃支配下の吐谷渾》, 第52页。

⑬ 周伟洲:《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 见周伟洲:《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 第359页。文书提到吐谷浑可汗巡游至色通(se tong), 此地即墨离川一带, 参见陆离:《敦煌本吐蕃文书中的色通(se tong)考》, 《敦煌研究》2012年第2期。

⑭ 《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 第4245页下栏。

浑的另一个政治中心,<sup>①</sup> 吐谷浑可汗驻牧于墨离川,其主要任务或即是镇抚吐谷浑西部的诸部落,并配合吐蕃军队进攻河西、西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吐蕃对吐谷浑之地的统治并不是只依靠吐蕃人,党项、白兰、吐谷浑诸部也是吐蕃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这些部落既是吐蕃镇抚各地的帮手,同时也是进攻唐朝时不可或缺的同盟军,缺乏这些部落的支持,吐蕃是不可能长久统治吐谷浑之地的。不过,这些部落并非一直效忠于吐蕃,在有合适的机会时,他们也同样会背叛吐蕃。吐蕃在征服吐谷浑、党项、白兰等部落后,虽然这些原本活跃于唐朝西境的族群逐渐远离了唐人的视野,从史书中消失,但这并不代表它们立即融入了吐蕃,相反,它们在吐蕃治下依旧保持了程度不一的独立性,只有理解这一独立性,我们才能对吐蕃统治吐谷浑之地的实质有更深入的了解。

吐谷浑之地的诸部落中,独立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党项。相比于有政权组织的吐谷浑,党项“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sup>②</sup>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体,这导致了任何外来势力想要完全控制党项都非常困难。早在吐蕃统治党项之前,党项部落的这一独立特性就已多次展露。吐谷浑与党项部落结盟期间,“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sup>③</sup> 到了唐初,党项又配合吐谷浑多次进攻陇右各州。贞观五年拓跋赤辞归附唐朝后,党项部落马上调转枪口,参与了唐朝对吐谷浑的攻击,“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边兵及契苾、党项之众以击之”。<sup>④</sup> 唐朝正式进攻吐谷浑前,拓跋赤辞表示“我当资给粮运”,<sup>⑤</sup> 而到了贞观九年“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sup>⑥</sup> 贞观十二年,吐蕃进至松州西时,“羌酋〔阔〕〔阆〕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sup>⑦</sup> 而阔、诺二州均为贞观五年设置的党项羁縻州。<sup>⑧</sup> 不难看出,党项部落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的依附对象,而是随着形势的转变,不断转向势力最强者。吐蕃进至党项之地后,同样不能完全控制党项部落,上文讨论的天授三年二十万党项部落降唐,直接促成唐朝势力大举西进就是彰显党项部落独立性的绝佳案例。

剑南的西山诸羌因同时摇摆于唐蕃之间,而被称为“两面羌”,<sup>⑨</sup> 剑南诸羌羁縻州也因“生羌相继忽叛”而“屡有废置”,<sup>⑩</sup> 诸羌的这一特性与党项非常相似。与诸羌和党项一样,白兰也始终未能建立统一的政治体,而是一直保持着分散的部落形态,吐蕃对这三个族群的统治力显然不宜高估。<sup>⑪</sup> 即使到了开元年间,党项和白兰也仍摇摆于唐蕃之间,甚至影响到了唐蕃关系,“二国有舅甥好,昨弥不弄羌、党项交构二国,故失懽,此不听,唐亦不应听”,<sup>⑫</sup> 弥不弄羌即白兰,<sup>⑬</sup> 两部直到此时都还有“交构二国”的能力,足见其独立性之强。在吐谷浑之地的部落中,吐蕃控制力最强的当属吐谷浑部落,吐蕃保留了吐谷浑的可汗,并与之通婚,

① 大谷 1086 号文书还提到“回赤水川来唤浑王”(文书录文参见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吐谷浑归朝案卷研究》,见《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第 494 页),赤水周边是吐谷浑的核心区域。此处的赤水川浑王与墨离川可汗应是一人,很可能只是因为吐谷浑可汗在墨离川、赤水川都曾停留过,故文书出现了两种称呼。

② 《旧唐书》卷 198《党项传》。

③⑤ 《旧唐书》卷 60《李道彦传》。

④ 《旧唐书》卷 198《吐谷浑传》。

⑥ 《资治通鉴》卷 194“贞观九年正月”条,第 6110 页。

⑦ 《资治通鉴》卷 195“贞观十二年八月”条,第 6139 页。胡三省认为“贞观五年,以党项降羌,置羁縻州,有阔州、诺州,皆属松州都督府,无阆州”(《资治通鉴》卷 195“贞观十二年”条,胡注,第 6139 页),阔与阆字形相似,阆州很可能是阔州之误。

⑧ 《旧唐书》卷 41《地理志四·剑南道》。

⑨ 《旧唐书》卷 197《东女国传》。

⑩ 《旧唐书》卷 41《地理志四·剑南道》。最能体现因诸羌反叛而屡有废置的就是维州,维州“武德元年,白苟羌降附……贞观元年,羌叛,州县俱罢。二年,生羌首领董屈占者,请吏复立维州……麟德二年,进为正州。寻叛,羌降,为羁縻州。垂拱三年,又为正州”(《旧唐书》卷 41《地理志四·剑南道》)。

⑪ 白兰部落也有归附唐朝的记载,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吐蕃白兰二品官董董占庭等二十一人来降,并授左武卫员外大将军”(《册府元龟》卷 977《外臣部·降附》,第 11482 页上栏)。

⑫ 《新唐书》卷 216 上《吐蕃传上》。

⑬ 杨铭:《弥不弄羌考》,《民族研究》2007 年第 1 期。

吐谷浑人还深度参与了吐蕃政治，在文化上也受到了吐蕃很深的影响，<sup>①</sup>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吐蕃与吐谷浑的融合程度都远远超过其他部落。但即使如此，每当吐蕃国内政治出现变动时，吐谷浑部落还是会倒向唐朝，圣历年间，以吐谷浑可汗为首，吐谷浑部落大规模降唐，开元十一年（723）“九月，吐谷浑率其众诣沙州内属”。<sup>②</sup>

可以看出，诸部落是服是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吐蕃控制力的强弱，吐蕃控制力强时，诸部落可以成为吐蕃的帮手，而当吐蕃控制力减弱时，诸部落则会随时背叛吐蕃，倒向唐朝。若我们进一步将视线延长，则可以发现从剑南到陇右，诸羌、党项、白兰、吐谷浑等部落以及他们所占据的广大地域，其实构成了一片南北纵贯的唐蕃“中间地带”，<sup>③</sup>唐蕃谁能控制这些部落，谁就能占据这一片中间地带，从而也就可以在剑南和陇右确立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自高宗时期开始，唐蕃间便已围绕这一中间地带展开过多次争夺，此后，天宝末期唐朝势力大举挺近黄河九曲，重新控制党项以及安史之乱后吐蕃收复黄河九曲进而攻占陇右诸州，都是唐蕃争夺中间地带的不断重演而已。

吐蕃要控制中间地带，首要任务便是征服中间地带的部落，而这一任务就是由噶尔家族完成的。显庆元年，禄东赞亲自率兵进攻白兰，苦战后收服了白兰。之后，从显庆四年到乾封元年的八年间，禄东赞大部分时间均常驻吐谷浑，<sup>④</sup>显庆五年“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sup>⑤</sup>龙朔中“吐蕃大臣禄东赞亦屯兵于青海之地”。<sup>⑥</sup>在这段时间中，禄东赞还先后征服了雪山党项、白狗、春桑羌，“吐蕃之并兼诸羌，雄霸本土，东赞有力焉”，<sup>⑦</sup>禄东赞在世时，诸羌、吐谷浑故地的大部分区域就已被吐蕃控制。禄东赞去世后，其诸子依然负责经营吐谷浑，唐蕃间的大非川之战、青海之战、洮州之战均由论钦陵和赞婆指挥，论钦陵子论弓仁“总众于东”，<sup>⑧</sup>赞婆更是“专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余年，常为边患”。<sup>⑨</sup>在噶尔家族的长期经营下，中间地带诸部落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抑制，这些部落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吐蕃进攻唐朝的重要帮手，吐蕃也因控制了中间地带而在陇右确立了对唐朝的优势地位。

噶尔家族世代经营吐谷浑之地，久而久之，噶尔家族与诸部落间自然会形成比较紧密的关系，《论弓仁神道碑》所载“吐浑以论家世恩”<sup>⑩</sup>反映的就是这一紧密关系。吐蕃经营吐谷浑的成功，既与噶尔家族的谋略有关，也是噶尔家族与诸部落紧密配合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在噶尔家族获罪前，吐蕃赞普很少到吐谷浑之地去巡视，<sup>⑪</sup>和吐蕃的其他控制区不同，吐谷浑之地更类似于噶尔家族的私人领地，如果站在吐蕃赞普的角度，难以掌控的噶尔家族也可以归入到中间地带的范畴。噶尔家族获罪后，论钦陵自杀，赞婆降唐，吐蕃与中间地带诸部落间的联系纽带被斩断，诸部落的自立倾向再次抬头，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吐蕃经营吐谷浑之地造成了巨大冲击。赞婆降唐后，论钦陵子论弓仁“以所统吐浑七千帐归于我”，<sup>⑫</sup>噶尔家族在吐谷浑的势力被一扫而空。噶尔家族获罪后，中间地带的诸部落瞬间失去了制约，各部落开始大规模背叛吐蕃，而与噶尔家族关系最密切的吐谷浑部落，更是成为降唐的急先锋。

① 青海都兰发现的吐谷浑墓群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中，就有鲜明的吐蕃色彩，韩建华将之称为“吐蕃化”，参见韩建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一号墓吐蕃化因素分析》，《考古》2022 年第 10 期。

② 《册府元龟》卷 977《外臣部·降附》，第 11481 页下栏。

③ 陈金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秦岭——淮水一线为核心的地区，是南北双方频繁争夺并长期对峙的地带，这片地带“两不相属而又两皆相属”，她将这片地带命名为“中间地带”，参见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3—14 页。本文讨论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等诸部也是同时摇摆于唐蕃之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秦岭—淮水一线类似，因此，笔者此处借用了陈书中的这一概念。

④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 1，第 193—194 页。

⑤ 《资治通鉴》卷 200“显庆五年八月”条，第 6321 页。

⑥ 《册府元龟》卷 996《外臣部·责让》，第 11696 页下栏。

⑦ 《册府元龟》卷 962《外臣部·才智》，第 11322 页下栏。

⑧ 《文苑英华》卷 909《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第 4783 页下栏。

⑨ 《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

⑩⑫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 17《拔川郡王（神道）碑（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850 页。

⑪ 从《大事纪年》看，从吐蕃东进开始，到噶尔家族覆灭的圣历年间，赞普主要活动于吐蕃本土，参见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 1，第 193—199 页。

论弓仁降唐的当年，论弓仁“勒兵境上，纵谍招之……从之者七千人”，<sup>①</sup>之后，凉、甘、肃、瓜、沙诸州又有大量吐谷浑部落降唐，<sup>②</sup>就连吐谷浑可汗也远赴墨离川，意欲在瓜州降唐。仅欲在沙州降唐的吐谷浑部落就有十万众，<sup>③</sup>若再加上其他诸州，则降附部落可能已达数十万众。郭元振在上书中曾提到，这些吐谷浑降众“非驱略而来，皆是渴慕圣化，冲锋突刃，弃吐蕃而至者也”，<sup>④</sup>全部都是在突破吐蕃的围剿后主动归附的，可见其归唐之坚决。由于降唐的吐蕃、吐谷浑部落实在太多，唐朝还以“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sup>⑤</sup>与吐蕃关系最密切的吐谷浑部落都大规模降唐，则其他吐蕃始终难以控制的党项、白兰、诸羌部落也势必会大规模倒向唐朝（详后），到圣历二年前后，吐蕃经营吐谷浑之地的两大依靠力量，噶尔家族以及吐谷浑、党项等部落都已先后瓦解。吐蕃不仅是对吐谷浑的统治面临危机，就连唐蕃边境的实力对比都已发生了逆转，理解这一点后，我们就能更好地认识唐蕃双方接下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了。

论弓仁降唐后，“吐蕃大下”，<sup>⑥</sup>但吐蕃不仅没能威胁到唐朝，就连参与攻唐的吐谷浑部落都被论弓仁招降了。从次年（久视元年，700）开始，吐蕃又对唐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据《大事纪年》，赞普在此年曾引兵至河州，<sup>⑦</sup>七月，“吐蕃将曲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sup>⑧</sup>《王仲玄墓志》亦提到王仲玄在该年被授予廓州刺史职后，“吐蕃大侵边鄙”。<sup>⑨</sup>之后，长安元年（701），赞普两度引兵至松州、洮州，<sup>⑩</sup>同年，吐蕃与突厥“大入河西，破数十城。围逼凉州，节度出城战没”，<sup>⑪</sup>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sup>⑫</sup>吐蕃虽数次攻唐，但这些进攻并非完全都是针对唐朝。论弓仁刚降唐，吐蕃就追赶而至，论弓仁则立马参与抵抗，“勒兵境上”，<sup>⑬</sup>这说明吐蕃追击的目标是论弓仁。赞婆降唐后，“仍令领其部兵于洪源谷讨击”，<sup>⑭</sup>次年唐蕃又大战于洪源谷，吐蕃的目的同样在于追击噶尔家族残余势力。

至于长安元年赞普两度至松州、洮州活动，则更令人生疑，旗手瞳就认为赞普几次远征的理由尚不清楚。<sup>⑮</sup>赞普亲自带兵已充分显示出吐蕃对两地的重视，若吐蕃真的两次进寇松、洮二州，唐朝文献理应留下像长安二年一样的赞普寇悉州的记录，然而，此战在唐朝文献中并无记录，这说明吐蕃并未对唐朝边境产生威胁。若再考虑到前一年赞普亲往河州、吐蕃进攻廓州，长安二年赞普又出现在悉州，则可以发现从久视元年长安二年的三年间，吐蕃大军实际上一由赞普率领在松、悉、洮、河、廓诸州附近活动。洮、河、廓诸州以西正是前文分析的黄河九曲，分布着大量党项部落，松、悉二州以西则是诸羌部落，联系到前文分析的

①⑥⑬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 17《拔川郡王（神道）碑（铭并序）》，第 850 页。

②④ 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 190《边防六·吐谷浑》，第 5167、5166—5167 页。

③ 72TAM225；33 号《武周豆卢军牒为吐谷浑归朝事二》文书提到“及百姓可有十万众”[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 413 页]，另外，大谷 3368+3367 文书还提到“迎接降浑七千”（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吐谷浑归朝案卷研究》，见《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第 493 页），则投唐吐谷浑部落在十万以上。

⑤ 《资治通鉴》卷 206“武则天圣历二年四月壬辰”条，第 6540 页。

⑦⑩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 1，第 199 页。

⑧ 《资治通鉴》卷 207“久视元年闰月丁酉”条，第 6549 页。

⑨ 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蒐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年，第 392 页。

⑪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补遗 1《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第 1588—1589 页。校注者将此事系于万岁通天元年（696），都督则比定为许钦明（第 1597 页），理由是《旧唐书》卷 6《则天后纪》载：“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吐蕃寇凉州，都督许钦明为贼所执。”但此比定不确，据《册府元龟》卷 429《将帅部·拓土》所载：“郭元振以则天大足元年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第 5177 页上栏）可知吐蕃此次攻凉州应发生在大足元年（701）郭元振出任凉州都督不久前，与万岁通天元年的吐蕃攻凉州为两事。刘安志将吐蕃此次进攻比定在久视元年年末到长安元年十一月之间，可从，参见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见《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07 页。

⑫⑭ 《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

⑮ 旗手瞳：《7~9 世紀吐蕃支配下の吐谷渾》，第 36 頁。旗手瞳在下文中猜测赞普远征可能是为了防止吐谷浑部落继续投向唐朝（第 36 页）。吐谷浑部落的主要聚居地在赤水和祁连山以南，松、洮二州附近主要是党项和诸羌部落的聚居地，赞普远征还是理解为镇抚党项、诸羌较为合适。

诸部落与噶尔家族的密切关系，以及同时期吐谷浑、西洱河诸蛮对吐蕃的背叛，<sup>①</sup>则在噶尔家族获罪后，黄河九曲的党项部落和剑南的诸羌部落应该也像吐谷浑一样背叛了吐蕃。

赞普这三年间活跃于黄河九曲和剑南西北部，其主要任务并不是为了攻唐，而是为了镇压从剑南到黄河九曲，这一广大中间地带的诸部落叛乱，赞普两次前往松州、洮州，说明这两地的党项、诸羌部落已大规模背叛吐蕃，吐蕃的统治岌岌可危。即使是两次规模甚大的河西之战，吐蕃的军事行动也不能排除是为了镇压祁连山以南叛蕃吐谷浑部落的可能，<sup>②</sup>毕竟吐谷浑可汗最初计划的从墨离川前往瓜州降唐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应该是被吐蕃镇压了。上述战役，纯粹把进攻矛头对准唐朝的很少，大部分可能都只是赞普镇压诸部叛乱过程中的副产品。

虽然次数众多，声势浩大，但上述战争中，吐蕃并未取得太大的战果。洪源谷之战，唐军“六战六克，大破之”，连吐蕃使节也承认此战“杀臣将士甚众”。<sup>③</sup>廓州之战，王仲玄“转战数日间斩首千级”，<sup>④</sup>悉州之战“都督陈大慈与贼凡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sup>⑤</sup>同样大破吐蕃。取得最大战果的是河西之战，吐蕃一度连破数十城，围逼凉州，但郭元振到任后“吐蕃素闻威名，相谓曰：‘我赞普犹惧，吾辈何可敌乎’。相率而去”，<sup>⑥</sup>唐军还是击退了吐蕃。洪源谷战前，唐休璟曾对吐蕃做过一番分析，认为“自钦陵死，赞婆降，曲莽布支新知贼兵，欲曜威武，故其国中贵臣酋豪子弟皆从之。人马虽精，不习军事，吾为诸君取之”。<sup>⑦</sup>噶尔家族被肃清后，吐蕃在吐谷浑之地不仅失去了诸部落的支持，还失去了一批如赞婆一样能征善战的将领。曲莽布支及其他酋豪子弟就是代替噶尔家族统领原吐谷浑境内吐蕃大军的新将领，“人马虽精，不习军事”并不是指吐蕃作战能力不强，而是指这批新将领不熟悉吐谷浑事务，与诸部落没有渊源。唐军能大破吐蕃，原因也正在于吐蕃还未形成新的吐谷浑统治体系。噶尔家族被肃清的负面效应，唐人也看出来了，杜佑在《通典·西戎序略》中即言：“因赞府杀其名将诸钦陵之后，累破败，遂劣于曩时矣”，<sup>⑧</sup>吐蕃对吐谷浑之地的统治已到了最为虚弱的时候。

### 三、唐蕃神龙会盟划界新考

神龙元年（705）到二年，唐蕃之间曾举行过一次会盟，史称“神龙会盟”。杨长玉勾稽史料，对此次会盟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最主要的贡献是理清了此次会盟中，唐蕃以白水和黄河为界，中间的地带则是闲壤。<sup>⑨</sup>按照这一划分，则唐蕃的分界将会从赤岭、湟川一线西移至黄河，赤岭以西的黄河周边地区，自青海之战之战后便一直被吐蕃长期控制，为何在神龙会盟时，黄河会成为唐蕃界线？唐蕃的势力界线是否在会盟前发生过变化？这一划界对唐蕃双方又有何意义？要解决这些疑问，我们还需要先回到武则天在位末期的唐蕃关系上来，毕竟神龙会盟的酝酿、谈判过程都是在武则天在位末期完成的。

如前文所言，噶尔家族获罪后，吐蕃在吐谷浑之地的统治逐渐陷入了危机，唐蕃实力已发生了逆转。长安二年九月，即吐蕃密集进攻唐朝后一年，吐蕃派遣论弥萨来求和，但这次和谈并未成功，十月“赞普率众

① 据《大事纪年》，长安三年冬，“赞普赴南诏，攻克之”，四年“冬，赞普牙帐赴蛮地，薨”（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第200页）。可知，长安三年后，赞普一直在西洱河一带活动。赞普前往南诏之地，与西洱河诸蛮对吐蕃的背叛有关。噶尔家族被肃清也影响到了吐蕃在滇西北的势力，唐朝乘机招揽了姚州诸蛮，直到赞普亲征后，诸蛮部才重新转归吐蕃控制，参见朱丽双：《8世纪前后吐蕃势力进入西洱河地区问题研究》，《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

② 旗手瞳就认为吐蕃将大军布置在唐朝边境，有防止吐谷浑人逃入唐朝的企图，参见旗手瞳：《7~9世纪吐蕃支配下の吐谷浑》，第36页。

③⑦ 《旧唐书》卷93《唐休璟传》。

④ 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蒐佚》，第392页。

⑤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⑥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补遗1《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第1589页。

⑧ 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89《西戎一·序略》，第5129页。

⑨ 杨长玉：《唐蕃接触中的河西九曲》，《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刘凤强认为神龙会盟中不存在设立闲壤，开元二年时唐蕃才有闲壤之约，参见刘凤强：《唐蕃会盟若干问题辨析》，《中国藏学》2023年第2期。神龙会盟中明确提到划为空闲的区域，而开元二年的唐蕃会盟并没有成功，不太可能划分闲壤，因此，笔者还是倾向于赞成杨文的观点。

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贼凡四战，皆破之”，<sup>①</sup>唐蕃再开战端。随后，唐朝发起反击，唐蕃遂在青海湖区域爆发了一场大战，《郭元振行状》载：

公以凉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扬天威。因征陇右兵马一百二十万，号二百万，集于湟州，营幕千里，举烽号令……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齐进。过青海，几至赞普牙帐。赞普屈膝请和，献马三千匹，金三万斤，牛羊不可胜数。公大张军威，受其蕃礼而还。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献马二千匹。<sup>②</sup>

吐蕃献马、金在长安三年（703）四月，<sup>③</sup>突厥遣使献马也在长安三年。<sup>④</sup>可知，行状所载郭元振击吐蕃事应在长安三年。从行状所载“过青海，几至赞普牙帐”看，赞普此时已经从悉州北上到达了青海湖附近。此前，赞普一直在黄河九曲和剑南镇抚诸部，长安二年十月悉州之战时，剑南诸羌已被降服，此时赞普又北上青海湖，说明经过数年的镇压后，黄河九曲的党项部落也已重归吐蕃控制，吐蕃已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了唐蕃对峙的青海湖、赤岭一带。吐蕃内乱后，久视元年八月，唐廷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州大总管，准备出击吐蕃，但“元忠在军，唯持重自守，竟无所克获”，<sup>⑤</sup>唐朝还是没有大举出击。此后数年，吐蕃一直在持续骚扰唐境，唐朝忙于防御，鲜少主动进攻，郭元振的此次出击，正是吐蕃内乱数年后，唐朝希望往西扩展势力的一次尝试。此次出征集合了两道兵马，号称百万，唐军从湟州，即鄯州出发，数道并进，不仅越过了赤岭，还到达了青海湖一带，甚至逼近赞普牙帐。

仪凤三年（678）青海之战后，青海湖周边区域基本被吐蕃控制，唐蕃较量的战场东推至赤岭、鄯州一线，圣历元年论钦陵即进兵至湟水流域。唐军此时再次抵达青海湖，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唐朝的势力再次跨越赤岭，自青海之战后，唐朝在陇右还从未实现过如此大的跃进。唐朝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战果，并不完全是因为郭元振指挥有方，相反，从行状所载看，唐蕃双方在此战中并未发生大的战争，真正促使唐朝顺利西进的其实是吐蕃势力的衰退。吐谷浑、党项、诸羌部落纷纷背叛吐蕃后，吐蕃的主要精力已经用在了重新镇抚诸部上，赞普为了镇压党项、诸羌叛乱，甚至数年间都只能辗转于黄河九曲与剑南之间。到了长安三年时，吐蕃虽勉强收服了诸部，但自身的实力也已被消耗殆尽。反观唐朝则不然，自高宗时期唐军转为常驻后，就一直在陇右大力发展屯田，武则天本人对屯田更是极为关注。宰相娄师德曾被武则天派往陇右任“检校营田大使”，后又“检校河西营田事”，<sup>⑥</sup>全面负责河陇的屯田。河州刺史冉实还因为“屯田最多”，受到武则天夸赞，认为“卿以足食为心，朕无西顾之忧矣”<sup>⑦</sup>。在常年经营下，唐军在陇右已具备了长期防守的实力，加之洮州之战后，唐军未再与吐蕃爆发大规模战事，有较长时段的修整期，故面对连年作战的吐蕃，唐军已占据上风，这也是赞普未选择与郭元振正面作战，而是很快就“屈膝请和”的重要原因。

长安三年吐蕃请求和亲后，“则天许之”，<sup>⑧</sup>并派遣甘元柬出使吐蕃，甘元柬“外辑强蕃，内安储位……遂使葱岩效款，湟渟澄波”，<sup>⑨</sup>唐蕃关系逐渐稳定了下来。此时，吐蕃对噶尔家族清算的负面效应已经渐渐显露了出来，不仅是吐谷浑之地的诸部落，就连南境的西洱河诸蛮、泥婆罗诸国都已背叛了吐蕃，<sup>⑩</sup>吐蕃急需从东境抽身以镇压南境叛乱。唐朝在此前的西进中，已极大地往青海湖区域扩展了势力，且在连年的战争后，

① 《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月、日参见《新唐书》卷 4《则天皇后纪》。

②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补遗 1《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第 1589 页。

③ 《资治通鉴》卷 207“长安三年四月”条，第 6562 页。

④ 《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上》。

⑤ 《旧唐书》卷 92《魏元忠传》。

⑥ 《册府元龟》卷 329《宰辅部·奉使》，第 3891 页下栏。

⑦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 16《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第 796 页。

⑧ 《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

⑨ 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36 页。

⑩ 西洱河叛乱参见上文，《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载：“吐蕃南境属国泥婆罗门等皆叛，赞普自往讨之，卒于军中”，知泥婆罗亦背叛了吐蕃。另据《大事纪年》，长安三年冬，“赞普赴南诏，攻克之”，四年“冬，赞普牙帐赴蛮地，薨”（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 1，第 200 页），黄布凡、马德认为大事纪年中的“蛮地”即汉文记载中的泥婆罗国（黄布凡、马德：《敦煌古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 102—103 页）。

“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岁月奔命，其弊不堪”，<sup>①</sup>“罢甲兵，垣疆场”已成为“国家之急务也”，<sup>②</sup>无论是吐蕃，还是唐朝，此时都已有了罢兵讲和的需求。长安四年正月，武则天打算从洛阳返回长安时，面对当地父老的挽留，武则天“以吐蕃和亲为词”，<sup>③</sup>与吐蕃和亲显然已成为武则天优先关注的事项。

但不久后，吐蕃赞普“卒于军中”且“诸子争立”，<sup>④</sup>吐蕃政局陷入动荡。<sup>⑤</sup>神龙元年正月，唐朝也发生了神龙政变，政局同样不稳，唐蕃和亲事就此搁置了下来。到了神龙元年七月，吐蕃正式遣使告丧，此时赤德祖赞已经即位，并由其祖母墀玛类摄政，吐蕃政局已渐渐平稳，唐蕃又开始了接触。从神龙元年到二年间，唐蕃围绕边界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在神龙二年达成了会盟。会盟达成后，唐蕃也初步划定了疆界，“吐蕃以河为界”、<sup>⑥</sup>“白水已来，中间并合空闲”，<sup>⑦</sup>关于河和白水的所指，历来存在争议，<sup>⑧</sup>杨长玉近期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河指的是今黄河玛曲至贵德县河段，白水则是倒淌河，<sup>⑨</sup>但笔者对这两个比定均持不同意见。河和白水是此次唐蕃划界最重要的两个地点之一，对两地的比定直接关涉到我们该如何理解神龙会盟的意义，以下笔者希望结合相关史料，对两地的所指提出新的看法。

杨长玉在比定河的位置时，并没有注意到唐蕃此前对河西九曲、黄河九曲的争夺历程，也没有对此时唐蕃的势力范围加以深究，这导致她的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玛曲至贵德河段以西是阿尼玛卿山和青海湖以南的吐谷浑故地，以东则是上文讨论的黄河九曲，若唐蕃双方以此段黄河为界，则河西侧当属吐蕃，东侧则属唐，然而，这一分界并不符合此时的唐蕃势力范围。从上文的分析可知，长安三年时，经过吐蕃赞普的连年镇压，吐蕃已经平定了诸部叛乱并重新控制了黄河九曲，此时要让吐蕃将黄河九曲拱手让给唐朝，退回河西，这是难以想象的。另外，黄河两侧的大片地区，自高宗时期吐蕃东进后便长期处于吐蕃控制下，唐朝势力虽在天授三年一度进入了黄河九曲，但持续时间并不长，玛曲到贵德一线的大部分区域，总体来说并不属于唐蕃的长期交战区，唐蕃并无必要在如此漫长的河段划分边界。此前的野狐河之会中，唐蕃也讨论到了划界的问题，当时双方划界的区域集中在四镇和以“青海故地”为代表的吐谷浑旧土，两地都是唐蕃激烈争夺的地区，比照野狐河之会的例子，神龙会盟中唐蕃的划界肯定也只会双方在反复争夺的地区。从玛曲到贵德县河段，唐蕃间的确有一段激烈争夺的地区，那就是著名的河西九曲。

河西九曲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河西九曲的所指，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讨论，但由于不少学者都将河西九曲和黄河九曲混淆在了一起，导致对相关史料的解释都存在问题。<sup>⑩</sup>杨长玉在铃木隆一的基础上，对河西九曲的所在进行了新的研究，认为河西九曲指的是黄河以西，以今共和县恰不恰河流域为核心的一片地区，其说可从。杨长玉虽已注意到河西九曲的重要性，但可惜的是，她对神龙会盟前唐蕃对河西九曲

① 《旧唐书》卷190《陈子昂传》。

② 张说著，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28《和戎篇送桓侍郎序》，第1355页。

③ 《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直谏第十一》，第6528页上栏。

④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⑤ 关于赤都松赞普去世后的吐蕃政局，可参见张云、林冠群主编：《西藏通史》（吐蕃卷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53—56页。

⑥ 《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第五》，第11650页上栏。

⑦ 《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第11527页上栏。

⑧ 佐藤长认为河指的是乌兰布拉克河，即今恰不恰河，但这一观点并无依据，不应轻易否定作为专称的“河”与黄河的对应关系，参见佐藤长：《再论“河西九曲”之地》，张铁纲译，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3辑，第52页。严耕望认为积石军西南皆属河西九曲之地，卢怀慎奏文中提到的吐蕃过河置军的区域，在黄河向西弓出之最西处，但这只是吐蕃置军的核心处，参见《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第542—543页。按照严耕望的这一论述，他应该是倾向于把整个黄河九曲的河段都视为是唐蕃分界，这一看法与杨长玉类似。刘满认为河指的是流经今河南县、同仁县、贵南县境内的黄河，参见刘满：《唐九曲及其相关军城镇戍考》，《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刘满的观点与杨长玉大同小异，均认为唐蕃划界的河段往西到了黄河九曲的西界，和杨长玉一样，刘满同样未注意到这一河段所在地区早已被吐蕃控制。白水的观点详见后文。

⑨ 杨长玉：《唐蕃接触中的河西九曲》，《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⑩ 关于河西九曲位置的学术争论，可参见杨长玉：《唐蕃接触中的河西九曲》，《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将黄河九曲比定为河西九曲的最大问题在于，黄河九曲是在河东，并非河西，严耕望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因为他坚持认为黄河九曲就是河西九曲，只得认为河西应改为河东，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第543—544页。其他学者的讨论也大都存在类似问题，不赘。

的争夺并未深究。和其他学者一样，她也认为河西九曲是在唐朝以金城公主汤沐邑之名赐予吐蕃后，吐蕃才获得河西九曲的，此前的河西九曲一直在唐朝掌控之中，<sup>①</sup>正是这一误判导致了将玛曲到贵德的漫长河段整体定为了神龙会盟的河界。

河西九曲的确是在先天中被唐朝让给吐蕃后才渐渐引起关注的，<sup>②</sup>但这并不代表河西九曲此前一直被唐朝所占据，更不代表河西九曲在此前默默无闻，相反，在唐朝以前，这一区域就已是不同政权间反复争夺的核心地域了。如前所述，恰不恰河，在隋唐时期又被称为赤水，因此，赤水地也构成了河西九曲的另一个名字。<sup>③</sup>一直以来，赤水地都是游牧部落活动的重要地区，<sup>④</sup>吐谷浑的核心区域就在此处，大谷 1086 号文书就提到“回赤水川来唤浑王”。隋唐两朝在进攻吐谷浑时，无一例外都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赤水。大业五年（609），“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属，西奔青海”，<sup>⑤</sup>贞观八年和九年唐朝讨伐吐谷浑时，樊兴和李道彦先后担任赤水道行军总管，二人的目标均直指赤水地，李靖率领的北路大军则“出曼头山，踰赤水，涉青海”，<sup>⑥</sup>同样是先攻占赤水地。吐谷浑内附后，赤水地和吐谷浑之地一起被纳入到了唐朝的控制下。吐蕃东进后，麟德二年（665）正月吐蕃“请赤水地以为牧野”，此前的龙朔三年，吐蕃已大破吐谷浑，兵临赤水地，赤水地如此重要，唐朝当然不会轻易让出，“帝不许之”。<sup>⑦</sup>咸亨元年的大非川之战后，“吐谷浑全国尽没”<sup>⑧</sup>，赤水地也由此转归吐蕃控制，之后，唐蕃的较量场地东移到了青海湖、赤岭一线，赤水地已不再是唐蕃的交界区，赤水之名也逐渐被湮没。

而到了先天中，河西九曲却从唐朝手中转给了吐蕃，这说明在此之前唐朝已重新控制了河西九曲。大非川之战后，吐蕃势力最弱，唐朝最占优势的时期是在圣历二年吐蕃内乱后。长安三年，郭元振率领陇右大军从鄯州出发，大举越过赤岭，往西到达青海湖一线，与河西九曲极为接近，我们有理由推测，河西九曲就是在此时被唐朝重新收入囊中的。唐朝势力西进后，河西九曲逐渐成为双方激烈竞逐的区域，并取代赤岭，成为唐蕃新的势力交界区，因此，神龙会盟时唐蕃在这一区域划分势力范围是合理，也是必要的。开元二年（714）卢怀慎、姚崇也提到“顷者吐蕃以河为界，神龙年中降公主，吐蕃遂过河筑城”，<sup>⑨</sup>两人专门提及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后，吐蕃才越过界河，这正好可与吐蕃以汤沐邑之名获得河西九曲相对应，也为界河在河西九曲提供了强有力佐证。

综合以上讨论，笔者认为神龙划界中的“河”指的应仅是河西九曲河段，也就是以今共和县境内为主的河段，河西九曲以西河段，则长期处在吐蕃控制下，唐朝难以染指，并无必要划界。河西九曲河段大致呈东西走向，河以南的黄河九曲为吐蕃控制，河以北的河西九曲则划入唐朝势力范围。铃木隆一所认为的此后吐

① 铃木隆一认为在高宗时代，吐蕃对以赤水为根据地的吐谷浑之地尚未确立统治地位，直到金城公主下嫁，吐蕃才获得了河西九曲，参见铃木隆一：《吐谷浑与吐蕃之河西九曲》，钟美珠译，《民族译丛》1985 年第 3 期。受铃木隆一的影响，杨长玉也认为吐蕃从麟德二年求赤水地开始，经过了近半个世纪才获得河西九曲，此前河西九曲一直被唐朝控制，参见杨长玉：《唐蕃接触中的河西九曲》，《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与铃木隆一不同，佐藤长认为龙朔三年（663）时，吐蕃就已占据了这一地区，但又无法解释麟德二年吐蕃求赤水地事，只好含糊地认为直到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后，唐蕃对赤水地的争议问题才解决，参见佐藤长：《再论“河西九曲”之地》，张铁纲译，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3 辑，第 52—53 页。龙朔三年时，吐蕃只是赶走了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并没有完全占领吐谷浑之地，麟德二年吐蕃求赤水地只是希望进一步向东扩展势力，直到大非川之后，吐蕃才控制了包括赤水地在内的吐谷浑全部领土，相关讨论可参见胡康：《从河源到赤岭——论唐高宗时期吐蕃在陇右的东扩》，见《唐研究》第 28 卷，第 580—587 页。

② 关于吐蕃何时获得河西九曲，史料记载不一，杨长玉比对史料，最终将之确定在了先天年间，参见杨长玉：《唐蕃接触中的河西九曲》，《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③ 佐藤长：《再论“河西九曲”之地》，张铁纲译，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3 辑，第 59—60 页。

④ 关于赤水地重要战略地位的阐述，参见佐藤长：《再论“河西九曲”之地》，张铁纲译，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3 辑，第 59—60 页。

⑤ 《隋书》卷 24《食货志》。

⑥ 《册府元龟》卷 985《外臣部·征讨第四》，第 11566 页上栏。

⑦ 《册府元龟》卷 999《外臣部·请求》，第 11721 页下栏。

⑧ 《旧唐书》卷 5《高宗纪下》。

⑨ 《册府元龟》卷 992《外臣部·备御第五》，第 11650 页上栏。

蕃越过黄河,是指吐蕃自东向西,从党项之地侵入吐谷浑之地的观点基本正确,<sup>①</sup>只不过吐蕃的方向应改为从南向北。

至于白水,杨文在讨论白水地望时,并未充分利用各类史料中关于白水的记载,也未注意到唐蕃此前在白水一带的争夺,因此,她所认为的白水在今倒淌河的观点也难以成立。鄯州有白水军,开元五年郭知运置,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sup>②</sup>吐蕃在开元六年十一月的上书中曾提到:“又往者平论地界,白水已来,中间并合空闲。昨秋间郭将军率聚兵于白水筑城”,<sup>③</sup>可知白水军所在地就是神龙会盟中的白水。P.2555《敦煌诗集残卷》收录了诗人由西往东,从敦煌到鄯州临蕃城沿途所写的诗,在《夜渡赤岭怀诸知己》后有《晚次白水古戍见枯骨之作》,<sup>④</sup>可知白水在赤岭以东,而倒淌河却在赤岭以西,倒淌河与白水显然难以勘同。倒淌河在赤岭以西,僻处青海湖东南角,仪凤三年的青海之战后,吐蕃势力已越过赤岭,<sup>⑤</sup>至迟在仪凤三年,这一区域就已被吐蕃控制,此地并不属于唐蕃激烈争夺的地区。

青海之战后,唐蕃争夺的重点是在紧邻青海湖的湟水上游。调露二年(680)七月,“吐蕃大将赞婆及素和贵等帅众三万进寇河源,屯兵于良非川。辛巳,河西镇抚大使、中书令李敬玄统众与贼战于湟川,官军败绩”,<sup>⑥</sup>永隆二年(681)五月“己丑,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将兵击吐蕃论赞婆于良非川,破之”。<sup>⑦</sup>河源即置在鄯城县的河源军,黑齿常之就是河源军使,从吐蕃和唐朝的行军方向看,良非川、湟川都离河源军不远,应该都在湟水上游一带。<sup>⑧</sup>河源军“正当贼冲”,<sup>⑨</sup>河源军以西的湟水上游正是唐蕃此时激烈角逐的地区。圣历年间的野狐河之会上,论钦陵提到“青海、湟川,实迺汉边”,<sup>⑩</sup>则到了圣历年间,湟川依然是唐蕃的势力交界带。永淳元年(682)“吐蕃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洞,八战八捷”,<sup>⑪</sup>可知,白水距离河源军也不远,应该也位于唐蕃激烈角逐的湟水上游。从这一背景出发,要寻找白水、白水军城等地,都应该将视线转到湟水上游。严耕望认为白水军在今湟源县境内,<sup>⑫</sup>崔永红结合史料和实地考察,对白水的地望进行了详尽分析,他认为白水军城应即今湟源县城东四里的北古城,<sup>⑬</sup>刘凤强也不赞成白水在倒淌河的观点,他认为白水应在湟源县白水村。<sup>⑭</sup>虽然具体地点尚有争议,但将会盟中的白水确定在今湟源县境内的湟水上游一带则无太大问题。

确定了河、白水的所指后,现在再来看神龙划界的意义就比较清楚了。河西九曲和湟水上游,均是唐蕃此前激烈争夺的地区,大非川之战后,河西九曲落入吐蕃之手,青海之战后,唐蕃在赤岭、青海湖一线均驻有大军,尽管双方仍在湟水上游激战,但彼此都没有太大的推进,双方因实力相当而达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但圣历年间,吐蕃的内乱使这一平衡局面被打破,吐谷浑、党项等部落大规模反叛后,吐蕃在吐谷浑之地的势力大为衰弱,唐朝则乘机西进,在长安三年重新占据了河西九曲。在唐朝实力占优的情况下,神龙会盟中的划界自然会倾向唐朝,以河为境后,河西九曲划归唐朝,大非川战后三十余年,唐朝再次获得了在吐谷浑故地的立足点。除了“以河为境”外,唐蕃在神龙会盟中还达成了“白水已来,中间并合空闲”的约

① 铃木隆一:《吐谷浑与吐蕃之河西九曲》,钟美珠译,《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鄯州》,第991页。

③ 《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盟誓》,第11527页上栏。

④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下》(英藏俄藏部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11页。

⑤ 青海之战失败后,娄师德出使吐蕃,“其首领论赞婆等自赤岭操牛酒迎劳”(《新唐书》卷108《娄师德传》),可知战后吐蕃势力已到达赤岭。

⑥ 《资治通鉴》卷202“永隆元年七月”条,《考异》引《高宗实录》,第6395页。

⑦ 《资治通鉴》第202“开耀元年五月己丑”条,第6401页。

⑧ 吴均:《日月山与大非川》,见《吴均藏学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426—427页。

⑨ 《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

⑩ 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蕃》,第5174页。

⑪ 《资治通鉴》卷203“永淳元年”条,第6412页。

⑫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第529页。

⑬ 崔永红:《唐代青海若干疑难历史地理问题考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⑭ 刘凤强:《唐蕃会盟若干问题辨析》,《中国藏学》2023年第2期。

定,所谓“空闲”,当与野狐河之会上,论钦陵提出的“拔去镇守……既不款汉,又不属蕃”类似,即将白水与河西九曲之间的地区都转为唐蕃缓冲区,使该地区既不属唐,也不属吐蕃。

这一地区的主要部分即青海湖东岸以及赤岭一线,青海湖也是唐蕃此前激烈争夺的地区,野狐河之会上,论钦陵就把青海列为唐蕃的两个交界点,郭元振也曾提出让吐蕃还“青海故地”,和湟水上游一样,青海湖一带也属于唐蕃势力交汇地带。长安三年,郭元振曾“过青海”,则在吐蕃内乱后,唐朝在青海湖一带的势力也当有所增长,在这一区域划为闲壤后,唐朝的势力也只能撤出。值得注意的是,河西九曲也在白水和黄河之间,若按照“并合空闲”的原则,则河西九曲也应在闲壤范围内,唐朝之后也未有在河西九曲置军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河西九曲确为军事缓冲区。不过,考虑到“以河为界”的明确规定,以及此后吐蕃获得河西九曲还需要通过杨矩向唐廷奏请,则在名义上河西九曲应还是属于唐朝,只不过唐廷未驻军控制。闲壤的出现,使得唐蕃自高宗以来在湟水、赤岭、青海湖区域的激烈竞争暂告一段落,唐朝自大非川战后数十年间的不利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陇右诸军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也大为减轻。此后的数年间,双方均遵守约定,未在闲壤区域内筑城置军,直到河西九曲被吐蕃重新占据,并设置九曲、独山二军后,这一状态才被打破。此后,开元五年、七年,唐朝相继在湟水上游设置了白水军、安人军,<sup>①</sup>原先划为闲壤的湟水上游也逐渐开始遍布军城,闲壤不复存在。

总体而言,神龙会盟达成的划界协议对唐朝是非常有利的,对此,唐朝上下也心知肚明。担任“吐蕃分界使”的郑绩就把此次划界认为是拓州,<sup>②</sup>即拓展疆域。先天年间,吐蕃利用唐朝内争的机会,重新控制了河西九曲,为了把这一成果固定下来,开元二年,吐蕃再次向唐朝提出了会盟、划界的要求。<sup>③</sup>唐朝则认为“所论分界,先有盟书”,并“敕(解)琬赍神龙二年吐蕃誓文,与达延定界”,<sup>④</sup>坚持神龙二年的划界。唐朝之所以不愿让步,就是因为拒绝承认吐蕃对河西九曲的占有,希望唐蕃的势力界线能退回到神龙二年时对唐朝有利的状态。不过,神龙会盟的达成,追根究底还是与噶尔家族被肃清后,吐蕃在吐谷浑的统治受到削弱有关,唐朝并没有足以压制吐蕃的实力,随着吐蕃对吐谷浑统治体系的重建以及军事力量的恢复,唐蕃间的短暂和平宣告结束,双方在陇右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激烈角逐中。

#### 四、结语

唐蕃在陇右的对抗可分为南北两线,北线在青海湖、河西九曲、赤岭、湟水一线,南线则在黄河九曲。武则天在位时期,唐蕃在南北两线均有对抗,唐朝先后利用两次有利时机,在南北两线拓展了势力范围。天授三年,黄河九曲的党项部落降唐后,唐朝势力乘势进入了黄河九曲,但在洮州之战失败后,被迫撤出。圣历二年,吐蕃赞普发动政变,肃清了长期经营吐谷浑之地的噶尔家族,导致了与噶尔家族关系密切的吐谷浑、党项、白兰、诸羌部落等中间势力大批投向唐朝,吐蕃对吐谷浑之地的控制由此大为减弱。唐朝抓住了吐蕃内乱的机会,在长安三年由郭元振率军大举攻入了吐蕃长期控制的青海湖地区,河西九曲也在此时转归唐朝控制。经过这次失败后,吐蕃被迫同意与唐朝约和,并在神龙二年实现了双方的会盟、划界。神龙划界后,唐朝不仅获得了河西九曲的控制权,还将湟水上游、赤岭一线划为了闲壤,唐朝由此摆脱了青海之战后的不利局面,军事压力大为减轻。

神龙会盟后,唐蕃在陇右的激烈战争暂告一段落,双方关系进入缓和期。吐蕃在清除噶尔家族后,开始

① 《册府元龟》卷 981《外臣部·盟誓》,第 11527 页上栏;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 172《州郡二·序目下》,第 4482 页。

② 《郑绩墓志》曾提到“属圣后诏郡国举贤良,公对策天朝,海内莫比……无何,充吐蕃分界使,因撰《拓州记》一卷。深明长久,有识称之”(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 1 辑《郑绩墓志》,第 116 页),圣后即武则天,从墓志所述看,郑绩充任吐蕃分界使的时间距离武则天并不远。这一时期,唐蕃有两次划界,一次是野狐河之会,一次是神龙会盟,前一次并未成功,则墓志所述的“分界”只可能是指神龙会盟,《拓州记》从书名看,当是对开拓疆土的记述,亲自参与划界的郑绩也明白河西九曲划归唐朝后,唐朝的疆土确实是大大拓展了。

③ 杨长玉:《唐蕃接触中的河西九曲》,《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④ 《册府元龟》卷 981《外臣部·盟誓》,第 11526 页下栏。

重建吐谷浑之地的统治体系。神龙二年到开元二年，几乎每年都有吐蕃本土的贵族来到吐谷浑，<sup>①</sup> 这些贵族取代噶尔家族，成为吐蕃统治吐谷浑的新力量，而随着吐谷浑之地的官吏任免被吐蕃朝廷掌控，吐蕃对吐谷浑之地的控制也日趋严密。长安四年，《大事纪年》中首次出现了黄河大行军衙，<sup>②</sup> 黄河以东的黄河九曲地区就在行军衙的管辖范围内。<sup>③</sup> 考虑到圣历年间黄河九曲诸部落曾大规模背叛吐蕃，吐蕃赞普直到长安三年才勉强镇压了诸部叛乱，这里的长安四年极有可能就是黄河行军衙的设立时间，而黄河行军衙设立的最直接目的应就是为了强化吐蕃在黄河九曲的军事力量，加强对吐谷浑、党项、白兰等部落的控制。此后，党项、吐谷浑等部落未再发生类似武则天时期的大规模投唐事件，吐蕃对吐谷浑之地的控制日趋严密。随着吐蕃实力的逐渐恢复以及对中间地带诸部落控制力的加强，吐蕃开始尝试打破对己不利的神龙会盟划界，努力将河西九曲重新纳入控制。在先天内政趁着唐朝内政不稳成功控制河西九曲后，吐蕃终于扭转了神龙划界带来的不利形势，与此同时，唐朝内政也在进入开元后稳定了下来，并再次与吐蕃争夺黄河九曲、河西九曲之地，在南北两线上，唐蕃又迎来了激烈对抗。

（责任编辑：周 奇）

## Tang-Tubo Competition in the Longyou Region during the Reign of Wu Zetian

—— Also about the Role of the Hehuang Tribes in the Tang-Tubo Rivalry

HU Kang

**Abstract:** After Tubo occupied the Tuyuhun's former territory, tribes like the Tuyuhun, Tangut and Bailan remained independent, forming a "middle zone" between the two empires. During the Tianshou era, the Tangut's mass surrender sparked a Tang-Tubo struggle for the Huanghe jiuqu ("黄河九曲"). In the Changan era, the Tang advanced westward into the Hexi jiuqu ("河西九曲"), largely due to the collapse of the Tibetan Gaer family and the subsequent defection of tribes in intermediary regions such as Tuyuhun. With the reversal of power dynamics, the Tang and Tubo concluded the Shenlong Alliance, which favored the Tang. The "river" in the agreement likely refers to the Hexi jiuqu section within present-day Gonghe, while "Baishui" corresponds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Huangshui River. Gaining control of Hexi jiuqu, the Tang achieved a success in Longyou comparable to recovering the Anxi sizhen ("安西四镇"). Thereafter, the Tang-Tubo conflict shifted westward from the Chiling and Shanzhou line to the Hexi jiuqu, where fierce battles ensued.

**Key words:** Wu Zetian, Tubo, Huanghe jiuqu, Hexi jiuqu, Tangut

① 旗手瞳：《7-9世纪吐蕃支配下の吐谷浑》，第36-41页。

②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第200页。

③ 陆离认为黄河大行军衙设置后，一开始管辖着今青海果洛、甘肃甘南一带，等吐蕃此后获得河西九曲后，河西九曲地区也归行军衙管辖，参见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节度使相关问题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4期。由于陆文将河西九曲等同于黄河九曲，故文中将黄河行军衙初设时的管辖区域限定在了靠南的果洛和甘南。将河西九曲与黄河九曲区别开后，我们就可以发现黄河九曲在洮州之战后就未再易手，吐蕃内乱时，黄河九曲诸部虽大规模背叛吐蕃，但经过赞普的连年镇压，诸部已被重新收服，因此，黄河行军衙初设时应该即已负责管辖整个黄河九曲地区，河西九曲则应是归临近的青海行军衙管辖。